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12期

【思想文化】

中国的第一次国家现代化——国民党在大陆的改革/楚天江

【百年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简史（1）（1966年5月-12月）/阎保定 陈沾纬

1. 风云初起 2. “六六事件” 3. “八一六”静坐与“九六”绝食

大庆公社：文革浪尖上的弄潮儿

——老报纸《大庆公社》第11号/胡拾音

附录：红代会大庆公社严正声明（第二号）

画说我的一生（16）/ 刘海鸥

上战场，枪一响……（下）（1967年8月-10月）

【评论】

文艺女兵的革命与爱情/石 岩

——刘燕瑾 1943—1947年日记解读

【序跋】

《国家首脑终身制》序/(美国)黎安友

《国家首脑终身制》作者前言/严家祺

【怀人】

中国青年报总编徐祝庆二三事/李大同

追忆邵燕祥/王端阳

【述往】

我被蒯团打手毒打十多个小时/陈楚三

【书讯】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新书出版 亲历与思考系列

1. 《周恩来要我批陈云》内容简介

2. 《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内容简介

3. 《周恩来领导财贸口文革史料汇编》内容简介

【思想文化】

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

——国民党在大陆的改革（1919—1949）¹

楚天江

现代化的含义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等各个方面实现转型，例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等。从欧洲列强在世界版图上划分殖民地开始，世界各个文明体就开始了自觉与反抗、向往与排斥、幸福与痛苦的现代化过程。正如汤因比所说，“虽然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的面貌是西方化了，但是它们的文化面貌却大体上维持着我们西方社会开始经济的和政治的征服事业以前的本来面目。”² ——导言

资本主义与现代化

当人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模式后，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农业文明的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进步缓慢，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入到效率更高的工业文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并非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自动进化到工业文明阶段，就像并非所有的游牧文明都能进入农业文明一样。比如从原始狩猎文明进化到游牧文明，再从游牧文明进化到农业文明，其实只有极少数人类完成了这一进化过程，绝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原始狩猎发展阶段或因淘汰而灭亡。工业文明最开始在英国出现，当时英国从游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才几百年的时间，其农业发达程度远远没有中国高，为何工业文明最开始会在英国出现？

“英国经验告诉人们，摆脱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民主获致成功的一大前提条件。”³从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只有西方文明自发地完

¹ 此文选自楚天江著《被西风吹尽：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未来》，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

²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46页，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³ 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348页，华夏出版社，1987。

成了这一进化过程，世界上其他文明系统都没有自发完成，最终只能通过被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从而完成这一演化进程。

世界文明版图上，只有欧洲自发地从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而其他所有的古老文明国家，如中国、印度、埃及，在农业文明时期都有过无与伦比的辉煌，甚至曾经让欧洲文明望其项背，但他们都没有靠自身进化到资本主义阶段。四大文明都属于封闭的内河文明，本质上缺少像海洋文明的扩张（海盗）基因。海洋文明不仅仅是拥有开阔的海岸线，民族的扩张野心和冒险精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和埃及都面向大海，造船技术一度十分发达，甚至先进于欧洲，并且都有过出海尝试，中国郑和七下西洋，起步很早，并最终没有走出海岸线。日本和英国一样同为岛屿国家，日本在学习西方文明之前，虽然对朝鲜、中国多有骚扰，从没有尝试走出东亚，由此可见民族的特性是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人的站立，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相对君权、神权和自然敬畏而言的。中国的农业文明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其发展程度已达世界领先地位，它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不断进行自我调节（王朝更替）的系统，靠它自身的力量很难打破这个系统，需要有足够大的外来力量来冲击。所以在农业文明长期过程中，虽然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都无法在这个系统中发展。

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了这种分化，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一方面，出现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为资本。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而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全部过程的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既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又给它造成了商品市场。在中国社会，缺少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第一，皇帝家族在名义上拥有全国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掌握山、林、湖、泽等土地资源，地方要员、大地主则掌握绝大部分耕地。以皇帝为首的管理集团，时刻警惕新的经济体对政权潜在威胁。在封建社会，皇帝对天下所有人，包括权高位重的大臣，不管是财产还是生命，都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虽然土地可以买卖，但缺少自由流动。第二，农耕文明的生

产方式几乎吸收了所有劳动力，社会缺少自由的劳动力。当社会出现大量流民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灾害和饥荒而逃生，不可能，也没有地方出卖劳动力。当自然灾害达到严重的程度，劳动力甚至也失去了价值。封建户籍制并不鼓励人口流动，并且封建社会没有建立社会教育制度，人口识字率极低，劳动力素质低下，缺少承担工业和商业基本要求的文化基础。第三，农耕文明传统上重农轻商，政府并不鼓励商业的兴盛，社会对从事商业人员的道德评价较低，“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无商不奸”是比较普遍的观念。第四，封建专制的压制，儒家文化的熏染，造就了独特的民族性格——服从管理和秩序、缺乏冒险精神和创新能力。大家都希望按部就班，潜意识中“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商业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创新。第五，在始终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来说，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如郑和耗费巨大财力七下西洋，并非为了扩大贸易。最为关键的是，中国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这种东方式专制是如此的令人窒息，以致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花了两千年在探讨“好的专制”和“坏的专制”，从来没有人思考过人的解放和新的社会形态。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持枪叩响了中国的大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实行西方的共和政体。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这些政策法规,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这是中国2000年历史上国体发生的第一次改变,尽管这很不彻底,但这改变却是革命性的。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布了古老帝国向国家现代化转变迈出了第一步。

国民党主导的第一次国家现代化（1919—1949）

中华民国建立,标志中国开始踏上现代化之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示,国民党的纲领是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核心,提出总统、国会和五

院制衡政府国体结构,强调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1914年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多卷入其中,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长足进步,民族资本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创立了一批优质的工业产品,甚至挫败称霸一时的同类洋货,上海、武汉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先后出现了工商业繁荣局面,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7年,国民党打败军阀,基本统一了中国,中国面临发展机遇。国民党开始推进工业化的政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成就,特别是在纺织、化工和运输业等方面。在1933年7月,中国《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发表26篇文章,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道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由道路之争和模式之争,演变为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中国学者也随之分化,没有再深入一步,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至3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民族工业发展进入了高潮,上海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轻重工业、外贸业和银行业,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外滩成为世界各大商业机构聚居之地。武汉成为雄踞长江中游的第二大城市,被誉之“东方芝加哥”,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在商贸的带动下发展起来,如沙市、宜昌等。除长江中下游等地外,四川省境内成都、重庆两地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企业既有官办,也有商营。官办者如机器制造局、火柴厂、肥皂厂、制革厂等,商营则有电灯公司、造纸公司、化工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大批民族企业、企业家及企业品牌,此时才诞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如上海“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上海商业银行的陈光甫、“灯泡大王”胡西园、“皂药双料大王”项松茂、“百货大王”马应彪和郭泉、“烟草大王”简氏兄弟、苏州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家族、“化工大王”范旭东、重庆的“船业大王”卢作孚等。他们大都有留学欧、美、日的背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学习了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知识,身穿与伦敦、巴黎同时的西装,生活习惯已基本西化。翻开历史资料,找出他们当时的照片,看看他们身着与巴黎、纽约同时的西装、流行的发型,他们的眼神以及表现出来的时代气质,再看看同期的伦敦、巴黎、纽约的人物照片,你就理解什么是国际接轨的含义,你也就知道我们早就接过轨了。我之所以在此描述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家的形象,是为了与50年后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后,重启现代化进程所出现的第一批农民企业家相比较,从中

探索社会变迁的奥秘。

中国历史上,由国民党主导的第一次工业现代化,同时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化的推进,并最终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帝制崩溃,军阀割据,国民党通过武力征服,重新确立和统一国家权威,在战争中确立了军事领袖地位的蒋介石,却更习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由于现代化是由上而下推进的,国民党过于依赖南方大资本家群体,最终导致官僚与资本结盟,形成了国家官僚资本,控制了国家经济体系。国民党忽视了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矛盾,使广大农村地区成为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角落。另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和封建社会人治方式的矛盾,维护国家权威的军事独裁和社会民主自由的矛盾,现代化在政治、文化和法律方面并没有完全展开,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化进程。

以国民党为首的统治集团,推进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不仅经历封建帝制向资本主义共和制艰难过渡,国家统一的系列内战,还经历了规模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长达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三年的国共战争。如何评价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成果,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可能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可以找出从1927年到1945年世界经济发展资料,通过数字分析和横向比较,找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和当时国际地位的坐标,可以发现国民党推进的现代化也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一,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民党社会管理虽然也很专制,但在社会现代化方面,如党派社团组织成立、开放报禁与自由办报、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还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也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的遗产。所以我们看到30年代,党派组织多如牛毛,民间办报十分流行,学生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大学相对独立,教授社会地位较高,如马寅初当街大骂蒋介石和四大家族而没有受到处罚,胡适婉拒蒋介石出任外长的邀请即可说明。30年代文学创作和电影杰作不断涌现,这些和1949年共产党开始推进的现代化相比,尤其和60、70年代的中国社会相比,对比十分明显。

第二,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国民党继续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保留五

院制衡政府结构。不同的是,蒋介石吸取在大陆的教训,在台湾开展了土地改革,由政府出钱赎买大地主的土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最终以市场经济的手段、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台湾虽小,也算是保留了蒋介石政治思想的样本,是原有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延续。

第三,1945至1949年,国共两党对决,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分为三,一部分怀着强国的梦想,留在大陆,参与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一部分因为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还有一部分则选择了英殖民地香港——正是这一部分人带来的资金、企业、人才和管理经验,给当时远远不如上海的香港注入了经济活力,为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

在蒋介石主政中国的时期,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走势,法西斯主义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其主要影响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意大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专政。作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都诞生在德国。在为一战失败的屈辱复仇的旗帜下,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们的支持下,废除德国的民主共和制,建立了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主义则成为德国第三帝国的精神指导。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德意法西斯主义有所不同。在日本,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日本法西斯主义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故称为“日本军国主义”。国民党推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有很重的日本色彩。日本只用了30年时间,居然晋升于世界列强,日本的成功,激励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一直和日本各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他领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等,大多留学日本,他们对日本社会发展有切身的感受,视日本的成功为亚洲文明的样板。另外,国家社会主义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曾留学日本,考察过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熟悉就下此断言。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与日、德比较类似的社会特征(集权专制传统),和民族地位(中、日亟须工业化来摆脱民族危机,一战失败使德意志民族甚感屈辱)使然,并且他们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对抗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的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社会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没预料，师从日本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最终被 1937 年的日本悍然入侵所打断，随后的八年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战出现的权力真空不断壮大自我，并且把革命重心转移大广大农村。于是，共产主义运动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最终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百年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简史（1）

（1966年5月-12月）

阎保定 陈沾纬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号召投入其中，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坎坷历程。

一、风云初起

公元 1966 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

5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干部文化革命座谈会，会上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书记处书记舒同作了报告。

5 月 19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西安地区大专学校、企事业单位、机关负责人会议，讨论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5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¹ 阎保定，男，1946年4月1日生，1968年12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河南科技大学电死工程学院教授，中国高等学校电工学研究会荣誉理事。

陈沾纬，男，1945年11月出生于江西修水。196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金属学热处理工艺及设备专业（金相42班）。先后就职于江西省修水柴油机厂、修水县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工程师。2006年元月退休。2000年退居二线后，应聘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培训中心从事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培训工作。退休后，受聘于TUV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和北京信标技术培训中心从事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培训工作。

5月22日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多次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研究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六位教师的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彭康主持党委扩大会议，在陕西省委压力下，会上重新提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的问题，认为凌雨轩的问题，过去定为政治性认识错误不对，应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北大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播出后，交大校园内出现了异常气氛，学生们纷纷酝酿写大字报，无心再去上课。电机系电制41班和全校其他班级一样，正在进行“革命大批判”，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为了紧跟形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学们商议给校党委写一份大字报，督促校党委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配有评论员文章《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成常同学找来墨汁，由班级大批判小组组长黄步钧同学口述，戴国民同学执笔，很快写好了大字报，然后由黄步钧、戴国民、成常等五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学校行政楼南墙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交大校刊编辑部把这第一张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行动拍了照片。不久，校园里出现了更多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彭康抛出凌雨轩，企图丢车保帅”“彭康亲自策划抄写、拍照大字报，企图秋后算账”“彭康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等等。学校秩序大乱，校党委宣布全校停课。

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端蔡来交大浏览大字报，并会晤交大党委书记彭康。

彭康主持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下午，彭康给全体党员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党员大会后，校园里出现了许多“誓死保卫校党委”“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

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但紧接着，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却愈来愈多，迅速掩盖了“誓死保卫校党委”之类的大字报，少数大字报已把矛头指向陕西省委和西北局。

傍晚，中心楼走廊、行政楼、图书馆四周的墙上，甚至图书馆大门前的水池边上和马路边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二、“六六事件”

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决定向西安交通大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后领导不力，引发了6月6日西安交大师生反对工作组的重大事件，史称“六六事件”。

1. “六六事件”真相

6月3日凌晨2时，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带领陕西省委工作组进驻西安交大。工作组进校后，马上要求交大师生主攻“三家村”，并提出“反对上街”“反对派代表赴京”等要求。

6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对交大文化大革命作出四点指示，包括“要把主要矛头对准‘三家村’”“大字报不要上街”“不提倡漫画活报剧和“要有良好的革命秩序”等。

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动力系压缩12班王永婷同学贴出大字报指出：“校党委抛出凌雨轩是大阴谋”。

6月5日早晨，省委工作组提出“重点放在揭发校党委”。

上午，机械系机制五年级贴出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质疑：为什么一再强调集中火力对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为什么要公布工作组同志的身份？等等。

下午，省委工作组召开全校共青团员大会，会上工作组多次强调：不要怀疑省委和工作组，不要胡思乱想！

晚上，省委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广播大会，工作组组长严克伦讲话。他说：彭康同志犯了错误，要作检讨；彭康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交大全体师生要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相信工作组完全有能力解决交大的问题！要求从6月6日起以班级为单位辩论“校党委是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

许多师生听了严克伦的讲话，产生了很多疑问：严克伦对彭康的态度为什么如此暧昧？为什么省委一直强调主攻“三家村”？为什么问题刚刚触及陕西省委、西北局就要急刹车？大家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纷纷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发电报，汇报工作组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有的师生整理材料准备赴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有的师生通宵达旦地写大字报。

动力系锅炉 31 班同学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了交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全班同学签名后，于 6 月 6 日凌晨 5 时，派同学骑自行车送往邮局。为了赶上飞往北京的班机，邮局职工用专车把送信的同学送到了机场。

研究生一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张题为《一场令人深思的通话》的大字报，揭露 5 日深夜工作组向邮电局追查交大向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人的姓名、班级并索取电报底稿。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师生们对工作组的做法强烈不满，校园中揭发工作组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一群群学生在校园四处聚会并发表演说，批评工作组的错误，电机系电制 43 班丁传鹤等同学在校园宿舍区报亭旁边摆起桌子征求大家签名，准备联名给毛主席发电报，电文内容是：“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我校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情况极为复杂，问题严重。我们急需党中央亲临领导。请速回电。”签名者多达 1683 人。

数理系应物 31 班曾兴玲、徐伟等同学买来了大幅毛主席画像挂在行政楼前，两边悬挂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巨幅标语，广播台不断播放歌曲《红军想念毛泽东》和《毛主席派人来》，人们期盼着党中央、毛主席早日派人来交大领导文化大革命。

交大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压缩 12 班王永婷以及机械系机制 52 班赵瑛等分别带领一部分同学去西北局反映工作组阻挠交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西北局有关人员回答说：“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对解决交大问题决心很大，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交大的一切问题。”

机械系金相 42 班写了三张评严克伦讲话的大字报：《同志？错误？检讨？评严克伦讲话》（陈沾纬执笔），《红线？黑线？——二评严克伦讲话》（朱德荣执笔），《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三评严克伦讲话》（陈钧凯执笔），贴在学生二食堂大门口。

数理系应物 31 班的梁蕴绵同学起草了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全班同学分

头抄写后，寄给一起参加社教的总参解放军同志请其转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都友农同学执笔书写了“强烈抗议西安邮局扣押交大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和信件”的大字报，全班同学签名后，派都友农等三位同学前往钟楼的邮电局张贴。

动力系锅炉 31 班派人将大字报贴到《陕西日报》社门口并发表演讲。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门口也贴有交大同学写出的大字报，要求报道交大文化大革命情况；还有许多同学到工厂、农村串连。学生第 1 宿舍出现大字报，呼吁建立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

李世英和一部分同学在行政楼 402 大会议室与严克伦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同学们慷慨激昂地揭露工作组的一系列问题，严克伦辩解说：“我们是陕西省委派来的工作组，你们把矛头指向我，是什么意思？”辩论刚一结束，工作组就授意交大广播台广播告示全校师生：402 大会议室的辩论是“把矛头对准了工作组”，是“围攻工作组事件”。

下午，省委工作组强令交大广播台播送《愤怒声讨 810-41 班反革命分子李世英》的稿件。

傍晚，交大广播台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播送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交大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交大的反革命势力不是小势力，他们捣乱是必然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上京请愿，不同意上街游行。我们认为：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机关，不相信西北局完全是污蔑。西北局认为：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对解决交大问题决心很大。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交大的一切问题，……”。

刘维娜同学贴出大字报《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一评西北局指示》，指出西北局强调“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和“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的说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许多师生关注刘维娜同学贴出的大字报，同时也隐隐为她担忧。一些班级的同学和工作组的辩论和抗争仍在继续，后来被说成是“围攻工作组”。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

6月6日晚，驻交大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了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北京的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参与“六六事件”的学生是“假左派、真反革命”，但由于陈伯达不同意，最终没有发表。

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发生的反对工作组的行动，开启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工作组之先河。

2. 白色恐怖五十多天

“六六事件”发生后，西北局连夜从正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财贸工作会议”上紧急抽调大批县级以上干部进驻交大加强工作组的力量。

在工作组的高压和分化瓦解之下，一部分同学的态度发生转变，校园内开始出现“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之类的大标语。

6月7日上午，工程物理系工作组找李世英谈话，追问是谁指使反对工作组的，为何反对工作组，李世英被监管。下午，工程物理系召开全系批斗会，开始批判斗争李世英。

刘维娜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一评西北局指示》大字报贴出不到两小时，工作组就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组织群众斗争她，逼着她交出后台老板，交出“反党组织”，交出“反党行动计划”。

6月8日，陕西省公安厅布置交大保卫处执行三项任务：①掌握敌情动向，注意发展左派；②加强校内要害部门治安保卫工作，防止敌人破坏；③注意工作团的安全，特别是严克伦的安全。

6月9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决定将“省委工作组”升格为三百多人的“省委工作团”，成立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团委员会，严克伦任团长兼党委书记，渭南行署副专员吴沙浪任工作团办公室主任。

省委工作团接管了交大全部权力。此后，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大规模的“查上当，放包袱”“深挖‘六六事件’幕后策划者”的运动在全校展开。

早上，工程物理系工作组责令李世英贴出原来写的“坚决赶走省委工作组，彻底挖掉省委、西北局反党黑根”的标语，企图以此引起群众“公愤”。上午，工作团将李世英押解到行政楼402大会议室接受批斗，而后在他身上涂浆糊、贴标语，脖子后面插上棍子，戴上高帽子在学校里游街。中午，李世英留下三封遗书后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救活。6月9日至20日，李世英在住院治疗期间，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揭发西北局、陕西省委及工作团在交大的系列严重错误。医院里监视的人把李世英看得很紧，他不能亲自去寄信，偷空利用买报纸的机会托一个卖报的同志送到邮局。但西北局陕西省委控制了邮局，邮局把这封信扣压

下来，转给了省委交大工作团。

自6月9日开始，各班级在工作团成员的直接指挥下“查上当、放包袱”，要求每个同学汇报自己6月6日的表现，如果有反对工作组的言行，必须检查交待。自我检查之后，还必须相互揭发，找出“重点对象”批判斗争，稍有不同意见，即被指认为“反革命”。无休无止的检查、交待、揭发、批判，分裂了原本团结友爱的班级群体，摧毁了同学之间的相互信任。往日的一些误会和分歧被无限放大，平时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被上纲上线，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动力系锅炉31班，工作组把6月6日组织上京汇报和贴大字报的同学打成“反革命”，调动外班同学贴大字报围攻，组织全班批斗他们并强迫每个同学“查上当，放包袱”。凡是反对过工作组的人，一切言行都被上纲上线，不仅要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还要交出“幕后策划者”。

在电机系电制43班，工作组于七日凌晨强行取走1683人的电报签名作为“反革命罪证”，他们挑动一些同学对电报签名发起者丁传鹤施加压力，强迫他承认“做了反革命也不敢做的事情”，企图把丁传鹤打成“反革命分子”，全班31人中就有17人被工作组内定为“牛鬼蛇神”。

动力系压缩12班王永婷同学被省委工作组打成“反党分子”，工作组指挥一些同学贴出“打倒反党分子王永婷”等标语，还在电影广场召开大会批斗，无中生有地说王永婷和在上海、成都等地实习的同学有“反革命的黑线”联系，是这些黑线的总根子。在外出实习的30个同学中，有8个同学被打成“反革命”。

数理系应力31班刘维娜同学的大字报分析有据，语言犀利，工作组对她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组织全系大会批斗她，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还说她这位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是“老奸巨猾的反革命老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数理系应物31班被列为“敌情严重”的尖子班之一。工作组首先煽动其他班级贴出“应物31班是反革命魔窟！”“把大闹邮局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等标语进行围攻，接着搞人人过关，追查幕后策划者。梁蕴绵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遭到一次次残酷的批判斗争和人格侮辱。后来，徐伟同学也被揪出成了“反革命”。

行政楼前不断出现大字报专栏，每个专栏一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反革命”被揪了出来。往日里欢声笑语、充满朝气的校园，现在却没有一丝笑容，没

有一点生机,有的只是一场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和惊心动魄的群众斗群众场面!

6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彭康、林星(交大党委副书记)、凌雨轩(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决定“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的一切职务,并对西安交通大学党委进行改组,在西安交大党委改组期间,由省委交大工作团党委代行校党委职权。”

6月18日,《陕西日报》发表关于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报道,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发表通讯:《西安交通大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同时发表社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把交大“六六事件”说成是“精心策划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详见1966年6月18日《陕西日报》)

同日,省委交大工作团在校内组织一万五千人大会,批判彭康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6月中旬到7月初,工作团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交大师生进行迫害。他们把一些“大反革命”杨克剑、王永婷等人关到学生12宿舍搞所谓的“动物展览”。工作团勒令他们把头从窗口伸出去,强迫全校学生轮流“参观”、指认、呼口号、吐口水、扔石子,对这些优秀的青年学生施加残酷的政治迫害和人身侮辱。

6月下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解放军报》记者来西安调查“六六事件”。

7月6日至8日,省委交大工作团主持召开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交大武装部部长董树梧担任校文革委员会主任。工作团团长严克伦在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彭康为“叛徒”⁰

7月9日上午,王永婷不堪受辱,以死抗争,在工作团组织的批斗会结束后,从三楼纵身一跳,结束了年仅23岁的年轻生命!

王永婷自杀后,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吴沙浪恶狠狠地说:“把狗日的拉去烧掉!”并且不准通知家属,可,怜王永婷的父母终究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7月5日,电真空31班学生沈丙辰因对前途无望服毒自杀;7月21日,图书馆职员龚起武因对运动产生恐惧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于8月16日身亡。

7月12日,严克伦传达刘澜涛对交大工作团的批评,说违反了《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中发[65]26号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编者注),没有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搞了“查上当,放包袱”。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参见《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

7月19日，交大工作团内部开始整训。

7月28日，北京颁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并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7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刘刚与李世英个别谈话，通知李世英不是反革命，李世英在工作团的安排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参见《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同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3日，党中央宣布为交大“六六事件”平反。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宣布“撤销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

根据交大工作团的统一部署，各系工作组召开“查上当，放包袱”重点人员座谈会，初步承认了错误。

8月3日晚，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交大的大部分师生员工参加了大会。

8月4日晚，全校师生在大操场集中收听7月29日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讲话的录音。三位领导说：对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强调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同学。他们对同学们说：“你们是主人！”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在五十多天里”“实行白色恐怖”。

8月5日晚，西安交大在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王甫、胡锡奎，候补书记刘刚、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章泽、严克伦等参加了大会（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北京开会），王林、肖纯

分别讲了话。

王林说：“交大工作团党委书记兼团长严克伦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实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无产阶级！现在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严克伦同志交大工作团党委书记和团长的职务，并责成其向交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公开检讨。”并宣布：“所谓，六六事件，是交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事件！”“这里我向因为‘六六事件’而受到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师生员工表示慰问！表示道歉。

严克伦和吴沙浪代表工作团在会上做了初步检讨。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会上印发了《解放军报》记者关于“六六事件”的调查和交大李世英写的材料。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作检讨。

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发生后，遭到陕西省委工作团的残酷镇压，全校近千人被揪斗，许多同学被打成“反革命”，许多教职员被打成“彭康黑帮分子”，导致两位同学和一位教工自杀身亡，一位同学自杀而抢救生还。

从6月7日陕西省委工作组宣布“六六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开始，笼罩西安交通大学的“白色恐怖”持续了五十多天。

三、“八一”静坐与“九六”绝食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西安地区的红卫兵运动渐入高潮，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开始走向社会，揭露和批判西北局、陕西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西北局、陕西省委应对失当，导致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连续发生两起大中专院校师生的抗议活动。

1. “八一六”静坐行动

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六六事件”平反，把交大师生从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但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并没有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8月5日交大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王林、肖纯在讲话中都把责任推到工作团团长严克伦身上，强调“西北局、省委的指示都是正确的”，只是“在认识上、分析判断上的错误”“对交大工作疏于检查，犯了官僚主义”，在宣布“‘六六事件’是交大革

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事件”的同时又说“至于极少数坏分子从中捣乱，那是另外一回事”，暗示“六六事件”中有“坏分子参加”，更有工作团的干部在下面散布“六六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还值得讨论”。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引起了交大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

8月3日晚上，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王林宣布撤销工作组，揪出反党分子、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说赵守一是陕西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总头目，是黑经总根子。可是师生们认为：赵守一的问题早已得到处理，现在把赵守一抛出来，是在“丢车保帅”，企图转移斗争目标，于是纷纷到位于建国路的陕西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

8月4日，西安其他院校的工作组也检查了错误，但仍然限制师生的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上街贴大字报等。师生们渴望听到中央的声音，急切需要知道外面的情况，于是开始相互串连，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8月4日至7日，在西北政法学院（简称“政法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简称“陕师大”）、西安医学院等院校发生多起工作组和西北局工作人员策划的扣押、围攻、斗争、殴打串连学生的事件。

8月7日，接连不断传来中央首长的讲话指示精神，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西安地区各大、中学校之间的串连普遍展开。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西安各高校师生立即响应，交大、西北工业大学（简称“西工大”）等院校师生员工还集合队伍，高举红旗，敲起锣鼓，上街游行、庆贺、宣传。

8月10日，毛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发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

8月11日凌晨2时许，西工大师生代表一百多人前往《陕西日报》社张贴大字报，遭到不明真相的报社职工的刁难和围攻。

同日中午11时，交大、铁一中、西安矿业学院（简称矿院）的同学在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张贴大字报时遭到围斗、殴打，铁一中的团总支书记郝振华身遭践踏受重伤。

8月12日，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电）的大操场上，交大、西工大、陕西工业大学（简称“陕工大”）、西北大学（简称西大）、西电（临委会）联合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表大会，各校革命师生员工逐渐联合在一起。

同日，由于各校揭发出来的问题更多地牵扯到省委、西北局，有的还牵扯到了前中宣部和高教部，前往省委、西北局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师生越来越多。

8月13日下午5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布。此后，西安市大规模开展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报喜活动。陕西省委调动前来报喜的工农群众以“辩论”的名义围斗、殴打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的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简称冶院）等校的师生，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

8月13日中午12时许，交大金相42班陈沾纬等同学去省委贴大字报，鼓励省委机关干部揭发省委和严克伦的问题。发现了一个专抄学生大字报署名名单的省委通讯员方根纪，陈沾纬等人收缴了方根纪抄的黑名单，要求省委机关处理此事并将处理结果告诉交大。

晚上，陕西省委机关党委书记何志云、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省委办公厅干部王封家等人通知省阶级教育展览馆、庆安公司、省话剧院、抗大豫剧团、西安东风平绒厂、人民大厦等单位组织群众来斗争“以交大为首的右派学生”“保卫省委”。省委门外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打垮交大、冶院、西工大、师大、西大一小撮右派学生的猖狂进攻”等巨幅标语。

8月14日上午，交大学生在省委附近的和平门墙上贴出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省委门前有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前来“报喜”，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打垮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陕西省经委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贾晓东、副厅长兼机械工业局局长张成功等人在省委墙上贴出一份大字报《打垮交大一小撮的进攻》，声言“保卫省委、西北局，坚决镇压交大右派分子！”并指挥“报喜群众”围斗学生。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还亲自动手打人，后来被受害学生指认。

上午11时左右，交大电制52班顿胜利等一行4人到省委看大字报，因为不同意“两个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遭到周围“群

众”的围斗和殴打，还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下午3时左右，事态不断扩大，又有十几名交大学生被围斗、殴打，背心被撕破，脸被涂黑，也被戴上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游街。

下午4时左右，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乘车前往省委，学生强烈要求他下车给受殴斗的学生解围。肖纯把被围斗的顿胜利等人带进接待室，却对学生说：“这是工农群众激于义愤。”学生们要求省委纠正“两个口号”的错误，肖纯承认“两个口号”的提法“有些不妥当”“在必要的时候再研究决定”，但接待室的同志却说“两个口号”“是对的，有道理”，省委副秘书长王景铭还和前来“报喜”的人一起高呼这两个口号。肖纯离开后，围攻、殴斗学生的事在持续。

交大、冶院大批学生到省委附近解救被围困的同学，半夜12时左右，陆续聚集到省委办公大楼对面示威抗议，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多，被围斗了一夜的学生才被解救出来。

愤怒的学生们贴出了“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的大标语。

8月15日早晨，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出面接见反映情况的同学，回答了几个问题，但是学生不满意，坚持不走，工作人员强行推拉学生离开。

上午11时许，西安工业学院（简称“西工院”）的大队人马到省委报喜，有人高呼：“西北局万岁！陕西省委万岁！”

西北局附近殴斗革命学生的事件也偶有发生。

外地来西安串连的学生一下火车就遭到围攻。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还接到一封匿名信，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

同日，交大、西工大、冶院等校的数百名师生到西北局请愿，要求西北局派人前去省委制止殴斗学生的行为。第二天早上7时许，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李登瀛同志才和同学们一起来到省委门前，结果连李登瀛也挨了打。

晚上，省委附近的大街小巷里，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点，谁敢说“两个口号”是错误的，就立即被围斗。后来发展为见到交大、冶院、西工大的学生就围斗，有少数坏人乘机在女同学面前耍流氓，一些社会渣滓也趁火打劫，许多同学的证件、团徽、校徽被抢。

8月16日，李登瀛在同学们的保护下，通过省委的高音喇叭纠正那两个错误口号，并讲了三点意见：1. 立即停止辩论；2. 不准打人；3. 谁打人就抓谁。但收效

甚微。

此时，省委附近殴斗学生的严重事件已经持续了两天两夜，“受围攻的学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遭到殴打的多达六百余人，重伤三十余人。”

8月16日，省委门前的千余名冶院师生自动汇聚在一起，坐在通往省委的建国路上示威抗议。中午时分，近万名交大师生员工冲出校门，来到了省委门前静坐示威，声讨一小撮挑起工农群众斗学生的黑手，队伍从建国路一直排列到和平门。接着，西工大等院校的师生员工纷纷前来支援，队伍达到三万余人，红旗如林，口号震天，革命歌声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

当日，参加静坐示威的交大、西工大等院校联合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静坐示威抗议活动。临时指挥部在现场召开“声讨陕西省委黑帮大会”，各院校师生员工愤怒揭发和控诉陕西省委的一些干部策划、组织、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罪行。一些附近的街道居民也出面作证，大会向省委提出了“八点最最强烈的要求”，限令省委尽早答复。

8月17日和18日，西北农学院（简称西农）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员工、临潼华清中学的部分同学乘火车赶到建国路静坐现场；远在三桥的陕西省机械工业学校的部分师生步行三十多里前来支援；西安医学院、西工院、西北财经学院（简称“财院”）、西北政法学院、陕西师大一附中、西安中学的部分同学也冲破重重障碍赶来参加，静坐示威人数达到五万左右。

8月18日凌晨2时许，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杨植霖来到现场。刘澜涛作了长时间讲话，主要精神是：1. 承认西北局在文化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2. 肯定并赞扬同学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3. 肯定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革命的口号，完全正确。指出“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是错误的。4. 指出发生的打人、抓人事件绝不是什么广大革命师生与工人、农民的冲突，要追查，一定要追根到底。5. 要文斗，不用武斗。6. 支持革命串连等。

刘澜涛讲话说当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请革命师生顾全大局撤离静坐现场，此后参加静坐示威的师生员工陆续回校。省委门前的静坐结束，但是围斗革命师生的行为还在持续。交大队伍回校经过和平门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阻拦。随后几天，反对静坐示威的标语、传单和流言蜚语满天飞。

8月20日,交大师生采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洋情在后文中另有叙述)。下午4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交大文革委员会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但在中心会场里出现了“严惩交大一小撮右派学生”的巨幅标语,后经中国人民大学代表三次抗议才撤掉。大会上刘澜涛、霍士廉首先讲话,却只字不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轮到学生代表讲话时,又安排“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西北政法学院的代表发言,引起交大等院校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冲向大会提出抗议。

会后举行庆祝游行。当交大游行队伍到达和平门外时,遭到数以千计不明身份人员的拦截和围攻,有暴徒手持棍棒袭击游行队伍,多人受伤,直到6时30分左右,交大的游行队伍才突破重重阻拦进入解放路。但在回校途中,又在钟楼和百货大楼附近遭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围攻和殴打,许多领袖像、语录牌、标语牌被打坏,很多师生员工的工作证、学生的校徽、钢笔、手表被抢走,一辆救护车也被捣坏,许多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同学重伤昏迷。但是师生们不畏强暴,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手挽手挡在前面,体弱者和女同学被保护在中间,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奋力突出重围,待师生员工全部回到学校时,已近次日凌晨。

8月21日,各校师生员工前来交大慰问,并积极印发传单,写标语、大字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事实真相。

中午,传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同志在北京接见交大等校赴京学生的讲话,指出静坐示威不是反革命,大字报可以上街,也可以在街上辩论,师生们倍受鼓舞。

8月23日,刚刚选举成立的新的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邀请西工大、冶院、西电等院校与交大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交大图书馆二楼开会。经过协商,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简称“统指”),以便统一行动,相互支援。会议推举交大作为主席单位,由交大代表主持统指的舵,李世英参加统指的领导工作。

8月25日,有群众在东大街报栏里发现当天的《陕西日报》第三版一则标题中“纸老虎”三个字端端正正印在了第四版毛泽东的头像上,随即向报社提出抗议。8月26日,交大、西工大、西电等院校的一些学生以此为理由包围了陕西

日报社，抗议陕西日报社“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的罪行，要求报社工作组严肃处理。实际上，“头像”事件仅仅是导火索，主要是革命师生早就对陕西日报社积极跟随陕西省委压制师生们的革命行动强烈不满，当天召开了“揭露批判陕西日报罪行大会”。

2. 交大文革总会的成立

自从8月5日省委驻交大工作团撤销以后，工作团在7月8日宣布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失去了权威，校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师生们自发组织了许多名目繁多的“兵团”“战斗队”等，各行其是。有的“兵团”“战斗队”把彭康和校党委其他成员戴高帽子游街，挂黑帮牌子示众；一些平时十分受同学们尊敬的钟兆琳、周惠久等老教授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子游街、罚跪；随意抓人批斗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师生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也十分担忧。

8月13日晚，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万人辩论大会。王林、肖纯、严克伦等参加了大会，面对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他们没有能够做出满意的回答，后来进入群众辩论，大家矛头一致，愤怒声讨省委、西北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世英同学在会上发表讲话，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状态，反对那些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更反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谬论，主张全校一致“集中火力打黑帮”，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

师生们贴出大字报，对校文革委员会在领导静坐示威活动中的软弱表现不满，也希望尽快结束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强烈要求重新选举成立具有群众基础的、权威性的文化革命领导机构。校文革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立即启动并主持改选工作，采用巴孩社原则选举新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首先，按照各系、部在编人数分配名额，各系、部推选出各自的候选人到学校担任校文革委员会委员。

8月20日，新推选出的校文革委员会全体委员在图书馆二楼开会，由老文革委员会的段会林、倪德辉召集主持，先选校文革委员会常委，然后新推选出的常委在一起开会，推选副主任、主任（当时称副主席、主席）。选举结果如下：主任：李世英；副主任：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委员：赵瑛、王春杰、冯成武、

程宗武、尹茂林、邵乐冲、戴慕蓉、张国强、蔡元基、沈文钧、郑叔良、朱奎林、罗洪涛、徐文明、李印生、刘军智、曹克明等，并随之成立了交大红卫兵总部。各系、部也相继改选了系文革委员会，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就简称为“交大文革总会”。

当时，交大校内有少数教职工和学生不同意交大文革总会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因而要求另外成立晒安交大文化革命临委会”。许多同学认为这是个“保皇派”组织，应该对他们采取“打、压”政策，但交大文革总会反对这样做。虽然临委会只有一、两百人，花名册上只有十人，李世英还是破例批给了他们两间教室作为办公场所，还给了一些必要的宣传用品与文具，特别是允许他们使用安装有大功率喇叭“九头鸟”的宣传车。10月21日，“西安交大文化革命临委会”成立。文革总会正确处理了与临委会的关系，团结了不同意见的群众。1967年1月14日，成立不到三个月的临委会自动解散，从此西安交大校内实现了文革总会的统一领导。

由于文革总会懂政策，讲策略，遇事同群众商量，注意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交大校内的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文革总会也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成为了交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核心。

3. “九六”绝食风波

1966年9月初，西安工业学院34名学生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贴出揭发校领导和省委问题的大字报，支持西安交大文革总会。校党委称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下令解散，组织批斗、围攻、殴打这些学生，甚至不给这些学生饭吃。

9月5日，北京的串连学生和交大、西工大等院校的师生6000多人在西工院大门外举行集会，声援西工院造反派，揭露和批判西工院党委领导干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9月6日，数十名北京的串连学生和西工院造反派学生来到陕西省委，要求省委出面解决问题，但陕西省委一直推诿、搪塞、拖延，学生们宣布从上午8时开始绝食。

西工院造反派派人向交大求援，交大文革总会研究决定全校出动支援西工院造反派，要求陕西省委立即解决西工院的问题：

(1)承认西工院和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动；

(2)罢掉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

交大广播台广播宣布文革总会的决定，全校万余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国际歌行进到省委门前的建国路静坐绝食，西工大、西电、冶院等院校的师生也陆续赶来支援，开始时大家士气高昂，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但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只好席地而坐，等着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

绝食行动开始后，统指召开各院校负责人会议统一认识，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推举李世英为总指挥。指挥部随即对静坐绝食队伍的秩序、安全保卫、医疗救护等作出了安排，并派人寻找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等负责人，同时，派人给党中央拍电报、打电话，希望中央了解我们的情况，敦促陕西省委火速解决问题。

很快，交大学生食堂送来了几大桶盐开水，交大医院的救护车也开来了，“九头鸟”宣传车也到达现场，校广播台的女播音员王国瑞不停地广播，给大家鼓舞士气。

9月7日，参加“绝食斗争”的人数达到5万多人，但是陕西省委主要领导霍士廉等一直避而不见，还发通知要求市民“辩论”绝食问题，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市民围攻、辱骂绝食师生，使得队伍情绪更加激动，有人高呼口号“绝食光荣，保皇可耻”“坚决改组陕西省委”“坚决罢刘澜涛的官，撤霍士廉的职”，也有许多市民同情绝食的师生，带着食品和水来到这里劝说他们用餐，市民们的一片好心让绝食的师生们深受感动。省委也安排了一些饭店送来了香喷喷的饭菜、大肉包子等，但师生们不为所动，坚持斗争，不达要求，誓不罢休。当日，天气炎热，骄阳似火，队伍中开始有人昏倒。

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到了绝食现场，并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学们见面座谈，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听取师生们的意见，力劝师生们吃饭，并答应将师生们的要求转达省委。

同日，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问题作出指示，批评了“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错误行为。

9月8日，昏倒人数不断增加，临时指挥部的李世英等人担心几万师生的生命安全，心急如焚。傍晚，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到绝食现场，经过李世英等人反复追问，霍士廉勉强同意绝食师生的要求。李世英为了师生们的生命安全，当

机立断宣布“我们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当天晚上，绝大部分师生撤离回校，但还有交大、冶院、西工大的36名同学对霍士廉的回答不满意，继续在省委绝食抗争。

9月9日，周恩来总理两次给刘澜涛打电话处理绝食问题。周总理指示：

“（1）对绝食停止辩论；（2）不要围攻和歧视参加绝食的同学；（3）指定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为参加绝食的同学治病。”总理还亲派飞机接绝食的同学代表到北京，并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总理仔细地询问了静坐绝食的原因，然后在肯定同学们革命热情的同时，批评了同学们“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新中国，搞这种大规模的静坐绝食，这种方式不好。”周总理还请同学们吃了饭。在北京的同学打电话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绝食风波方告平息。

九天后，即9月17日，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检讨说：“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9月28日，交大“文化革命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先后接待前来参观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员工超过十万余人，群众写过的热情洋溢的留言簿有二百五十多本。9月份，交大文革总会组织了彭康专案组，由工企11班学生史立民任组长，就彭康三十年代的历史开展调查，查清西北局宣传部干部王XX的揭发材料不实，不能确定彭康为叛徒。

10月12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成立，其负责人为庆安公司调度员张培信、技术员安文保。10月27日，交大革命师生员工赴西安市体育场参加“西安地区誓死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650多个单位35000多人，大会通过了《致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

11月1日，由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办的《人民交大》创刊。11月6日，西安交大在大操场举行“西安交大，六六，革命造反纪念大会”。兄弟院校、工矿企业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小组组长杨植霖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作了检查，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刘刚、陕西省委书

记处书记肖纯、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韩劲草、办公厅副主任张志轩也在会上回答了有关问题，张志轩对“六六事件”的错误处理负有直接责任，被留下继续检查。

12月6日，由红色公社临委会等七个公社农民组织发起成立“西安地区革命农民文革总会”（简称“农总会”），负责人为田杏云。■

【百年中国】

大庆公社：文革浪尖上的弄潮儿

——推荐老报纸《大庆公社》第11号

胡拾音

1966年10-11月，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干了两件出奇的大事：砸“工业学大庆”展览、砸孔庙。这两件大事都得到高层的支持，这也是至今未解开的迷。师大“学大庆”战斗队曾于66年11月到大庆搜集余秋里的材料。1967年3月6日，该战斗队贴出题为《从大庆道路看余秋里的野心》的大字报。

1967年3月7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院919、新人大公社、民院东方红六个单位首先发起“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浪潮。批判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由于对“逆流”的认识不同，北京的群众组织分为“打倒派”和“炮轰派”。“炮轰派”的基本观点是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周恩来。应当说这是人民群众自发地对倒行逆施的抵制。

当年，“炮轰派”遍布高校、国家机关、工交、财贸、外交等多个领域。在高校主要有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北外红旗、人大三红、财经八八、轻工红鹰等。最突出的是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他们一直强调“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信得过。”为此，遭到中央文革的强烈打压。

1968年3月11日，中央首长接见高校学习班代表，听各方面的意见。下面节选一段：

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二月逆流”中我们是有错误的。

江青：你们一贯正确？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

总理：应该讲讲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

（大庆代表谈 5.16 问题）

江青：5.16 是我们搞出来的，你们捞不到什么，我们搞 5.16 时你们还不知道睡到什么地方去了！

伯达：（对代表）好了！

江青：文化革命一年多快两年了，你们还是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从头到尾一贯的保，你们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一派。你们口头上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要炮轰我们，你们轰吧！我们不怕！毛主席对余秋里提出要一批二保，你们就是保，你首先要做自我批评，否则我们不听。“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是红卫兵，该不该有革命的义愤，保的就是一贯不正确，不听。

伯达：一贯的不正确。

文元：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谢富治：把矛头指向了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批评，对大庆公社可谓压力山大。当年就听说师大“学大庆”战斗队曾写了一篇揭发余秋里的文章，但始终未能看到原文。近日有幸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份小报：1967年3月27日由红代会北石大庆公社宣传组主办的报纸《大庆公社》第11号。这份小报转载了这篇寻觅已久的文章。《大庆公社》转载时，认为第一部分涉及国家机密，做了省略。

从后面的批判文章《质问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指出问题的核心：学大庆战斗队说：“余秋里破坏了战略部署，集中全部兵马打大庆油田，是有个人目的的。”他们把大庆会战污蔑为余秋里个人野心。《从大庆道路看余秋里的野心》一文说：王铁人的“铁人”二字是余秋里作报告时起的名字，在王进喜钻井队之处只有一户地主婆，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

笔者印象中是，关于“铁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房东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没

日没夜地领着工人在干活，就感慨地说：“你们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余秋里部长听说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学大庆”的笔下“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狗嘴，不管指的是房东还是余秋里，都是对王进喜的否定。

报纸有几条简讯，也为师大井冈山反总理提供了证据。67年3月23日凌晨，总理接见大庆赴京代表团等组织时讲：“昨天有人问，余秋里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怎么会带他们接见你们呢？”几个小时以后，师大井冈山作战部发表声明：“余秋里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谓针锋相对！

看到红代会大庆公社严正声明（第二号），非常惊讶！它竟然对“二月逆流”做出与中央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目前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利用“三结合”的机会搞假“三结合”，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还企图利用一些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否定大庆，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进而扰乱阶级阵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表现形式。这个阴谋是隐藏在“打倒余秋里！”“火烧李先念！”“炮打李富春！”的口号后面。对此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给予回击，彻底打垮。

请注意：这个阴谋是隐藏在“打倒余秋里”“火烧李先念”“炮打李富”的口号后面。太直白、胆子太大了、太正确了。大庆公社不愧为文革浪尖上的弄潮儿！

今天推荐给读者这份《大庆公社》，往事并不如烟！历史资料总会告诉后人什么是真相。

2022.1.6

【附录】

红代会大庆公社严正声明（第二号）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飘飘军容壮，万马奔腾杀声紧。革命的“三结合”威力无穷，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丢盔卸甲，闻风丧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好得很。

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目前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利用“三结合”的机会搞假“三结合”，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还企图利用一些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否定大庆，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进而扰乱阶级阵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表现形式。这个阴谋是隐藏在“打倒余秋里！”“火烧李先念！”“炮打李富春！”的口号后面。对此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彻底打垮。为此，我大庆公社再次发表严正声明：

1.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拨开迷雾，认清方向，识破这股逆流的制造者就是刘、邓、陶、薄及其黑爪牙。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打倒刘、邓、陶、薄，揪出其死党及爪牙！

2. 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对于余秋里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从来就认为必须彻底批判。在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分清是哪一个司令部的人。否则，不加区分的乱“轰”乱“打”势必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对那些浑水摸鱼，胆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扒手，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3. 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4. 坚持斗争的大方向，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切切不可把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组织。

5. 红代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树起来的一面红旗。我们坚决和红代会的成员一起，高举这面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乘胜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彻底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毛主席！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红代会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1967. 3. 22

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

编者按：大庆是毛主席树起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阶级敌人始终把大庆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诋毁大庆，妄图撕毁这面旗帜，否定大庆道路。也有一些人，口口声声“学”大庆，“保护”大庆红旗，实际上他们干的是反大庆的勾当。这里我们摘要刊登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的一份材料《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请大家鉴别一下，这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

一、（从略）。¹

二、余秋里是忠实贯彻刘少奇指示，搞石油托拉斯，把大庆变成独立王国。

余秋里追随刘少奇，在大庆，九二三、玉门等石油基地大搞政企合一，把石油系统变成独立王国。大庆就是一个典型。大庆是一个独立王国。

1. 余秋里等树的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大树特树刘少奇、石油部个人和工委的权威。大庆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一般工人很少看报（没有报），又无广播，主要指示完全以工委名义下去。在去年十一月以前，大庆极少看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室内张贴的都是“约法三章”。

《战报》登的文章中，不讲毛主席教导，而大讲“工委教导我们”，工委不喊“毛主席万岁”，却大喊“刘少奇万岁”“大庆工委万岁”。

¹ 因该大字报的第一个问题中严重泄漏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部署问题，故翻印时从略。

石油部副部长在给××石油学院下黑指示时，只要学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承认“工作组有缺点，……调子要高，就是跟部、工委不那么紧”。他们就是不提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石油部搞什么余秋里语录，康世恩（石油部副部长）语录（见揭发材料）大庆工委是最典型的“老子就是党”“老虎屁股摸不得”。几年来，任何人只要提一点意见就被残酷地打下去。大庆针插不进，里面消息出不来，外面消息进不去。

2. 政企合一，余秋里在大庆搞政企合一，操纵大庆的一切，大权独揽，工委就是最高法院，政法服从于企业领导，地方政府不过是一块牌子而已。因此，司法部门完全按工委的旨意，镇压群众。正因为这样，法院院长就配合工委偷北京拍给我去大庆串联同志的电报。大庆工委最害怕北京的消息。因为政企合一，工委竟敢违反国法，私拆外地给大庆的信件，偷电报，烧传单，大庆拍给外地的电报无理扣压，邮电部门变成镇压群众封锁中央消息的重要工具，在大庆电话都有人偷听，我学大庆战斗队在大庆打得一般电话或长途电话，工委都偷记下来，准备算总账。政企合一使得余秋里的工委成了太上皇，他们主掌了大庆的生杀大权。

3. 欺骗中央，大庆工人是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余秋里利用这一点压迫工人，培养奴隶性，余秋里为了谋取劳动力，申请要招收一万多青年，中央不批，他们就打着办工读学校的幌子招了一万多青年，名为工读，实为徒工，公然宣扬大庆特殊。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的指示，不适用于大庆，大庆的学生以工为主。如炼厂的工读学校，上学一年只上一个多月的课，其余时间都劳动，学生劳动强度太大，健康损害极大，有的学生劳动病了，工委就一脚踢开。大庆有许多成绩，但余秋里是谎报了许多情况的，他欺骗中央的事很多。

甲、余秋里在大会堂吹嘘大庆家属缝纫厂都是家属，其实全厂有老师傅五十多人，职工子女五十多人，外宾参观就把老师傅关在以小屋里说“土豆”。

乙、王铁人的“铁人”二字是余秋里作报告时起的名字，在王进喜钻井队之处只有一户地主婆，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

丙、大庆家属演出队很多是学徒工，半工半读学生，没有几个家属，演出队到北京演出，没有结婚的姑娘也要说有两个孩子。工委就是这样沽名钓誉。

丁、1966.5.3. 工委叫采油一个机耕队陈秀英去装家属开拖拉机，欺骗总理和谢胡同志，说她是丰收村的家属。

4. 白色恐怖

工委制定了许多水牢，名为政治性菜窖，工委制了许多脚镣手铐，为灭口，工委决定今春把制镣铐的人枪毙，更为严重的是，工委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生产枪支，弹药，通过非法途径，搞武器图纸，制造了机枪，步枪，手榴弹之类，还准备造坦克（用拖拉机和无缝钢管制造）、飞机武器零件，分别在许多厂加工。工委的这些罪恶活动真是触目惊心。

5. 在白色恐怖中，敌特活动猖狂，经常有敌特打信号弹，跳伞，发电报等，但公安部门都没有破案，专政对敌人一点不强，直到今年二月份，还有敌特打信号弹之类活动。相反公安部门驻大庆驻军却帮助窝藏黑材料，对抗中央军委指示。

6. 假树标兵，余秋里树了一些为自己服务的标兵，许多标兵不是群众选举的而是石油部、工委指定的。如：困难时期大量盗窃国家物资换吃的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第一个跳进泥浆池的不是王进喜（见附表）而余秋里把他树为标兵。

何太行：大庆石油地质学校一个反革命分子，大量抢劫国家机密，公开反对大庆道路，胡说毛主席受蒙蔽了，她是一名“联动”，是反动组织——大庆工农兵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的小头目，石油部要提她为石油地质学校的副校长，并准备不要预备期发展成为正式党员。何太行现捕于北京公安局。

工委在××石油学院树的标兵刘学英（资本家女儿）完全是一个堕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工委大树地主出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文章为标兵，大肆吹捧刘文章是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余秋里亲自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人的“事迹”“大庆展览”中石油部不惜用大篇幅吹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文章。工委搞不少典型是假的，是欺骗毛主席的，是有他们的野心的。

7. 大庆浪费物资，浪费劳动力十分严重，工委向中央不断要许多技术人员，大学生，结果到大庆都是画画，办展览之类，所谓业余演出队，脱产演出快一年，完全成了专业队，工委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合同工，轮换工制，大买廉价劳动力，大搞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轮换工完全是包身工，制造等级差别，剥夺这些工人政治权利。

8. 刘、邓、彭、罗、陆、杨、贺龙、朱德，先后到大庆，工委专门为他们编制指示辑，余秋里经常把大庆情况向刘少奇汇报。六四年九月刘少奇指示石油部办工业托拉斯。余秋里在大庆大搞刘、邓的东西，直到十一月一日大庆还树大牌

子宣扬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刘少奇指出大庆矿区建设搞什么男工女农之类，刘少奇要大庆农业生产搞得自由点，生产也要活泼点，不一定整天搞，老人小孩都可以参加，你不给他一点工分就没有兴趣了，也给他一点工分。在石油部的大庆赞歌是以大庆展览为主题思想的，副部长康世恩在十一中全会后审查影片时还有大肆吹捧刘、邓、彭的镜头。

9. 大庆搞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工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能发表不同意见，领导上是典型的“管”字当头，就是余秋里有名的十五个“严”字。余秋里在大庆搞什么“约法三章”“三老四严”主要是对付群众，整群众。在困难时期他大跳交际舞，他们住的干打垒，里面是砖砌的，外面抹上泥，造价比楼房还要贵。工人除了劳动外没有工余时间，每天从起床到睡觉都按照集体活动，无自由支配时间；无法好好学习时事政治，只能跟着领导转转，到了大庆就像到了与世隔离的天地！

10. 文化革命充分暴露了余秋里变大庆为独立王国的罪恶目的，大庆工委残酷的制造了长达半年多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实，创造性的自觉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委利用控制的邮电系统封锁中央消息，烧毁外来传单，扣压信件电文，拦截电话，把大批闯将打成“反革命”，下放劳动，或软禁于菜窖。石油部专门送机密文件给工委，尤其是“论‘造反者’”“四元帅讲话”“陈伯达的接见誓死卫东队的讲话”等大毒草。而中央文革小组讲话却视为非法，不可信，工委办赤卫队，利用标兵镇压群众，……一言以蔽之，工委搞的反动路线，罪行累累，骇人听闻，是全国少有的典型。

余秋里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他在十一月初给宋振明（工委政治部主任、实力派）打电话，叫冬季生产安排得紧些，大庆是打不倒的，余秋里抓生产挤革命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余秋里到计委后，大庆的一切重要问题仍然要余点头同意，他把大庆变成铁打的独立王国。康世恩去年八月给出国的周文龙副部长说，你们回来去大庆报到。康世恩还给局厂领导干部说，石油部垮了，你们可以自动到大庆去集合，大庆是去××万人也冲不垮的，这番话里看出大庆成了余秋里、石油部的独立王国，成了他们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的堡垒，余秋里是个十足的野心家。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

学大庆战斗队整理 1967. 3. 6

北京石油学院 北京公社胜利红旗转抄 3. 11

质问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

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反毛泽东思想反大庆道路罪责难逃，我们坚决给予彻底清算。学大庆战斗队打着学大庆的旗号，干着反毛泽东思想反大庆道路之实。他们妄图全面否定大庆道路，抽掉大庆的灵魂，想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树起的这面红旗搞掉。我们坚决不答应；必须给予迎头痛击，我们强烈要求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立即回答以下问题：

1. 你们说：“大庆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指示。”“一般工人很少看报（没有报），又无广播”“去年十一月以前大庆很少看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战报》登的文章中不讲毛主席教导”等等。一句话，就是说在大庆长期不是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那么，大庆人在60年代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条件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拿下了大庆油田，建设了现代化大型炼油厂，使我国石油自给，摘掉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为毛主席争了光，为全国人民争了气，打破了苏修的经济封锁。这是靠的什么力量？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大庆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难道周总理说错了吗？你们说大庆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的矛头究竟指向谁？

2. 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动员了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大力支援，各石油院校也直接参加，按照毛主席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开展了石油大会战，拿下了大油田，打破了中国贫油的谬论，摘掉了我国石油落后的帽子，使我们走上了石油自给的道路，为毛主席争了光，我中国争了气。而你们却别有用心的闭眼不看大庆油田开发，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由被动变主动的战略转折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不管石油勘探的规律，硬把它说成是：“破坏了石油工业战略布局，是余秋里的野心？！”难道我们能看着苏修这帮混蛋，在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利用我国石油工业落后，卡我们的脖子，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企图扼杀我们吗？我们能看着由于我国没有石油，飞机不能上天，汽车、坦克不能行驶的困难境地延续到今天吗？我们能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为迅速解决我国石油的事，而日夜操劳不止吗？在六〇年困难的日子里，全国人民谁

不想要立即解决石油产品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是余秋里的个人野心吗？为什么你们忘记了过去的困难，不顾当时的具体条件，用“余秋里个人野心”来否认大庆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你们的居心何在？

3. 毛主席号召我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毛主席号召要学习的大庆，你们却把它说成是“一个典型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去，针插不进”“到了大庆就是到了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是一个敌特活动猖狂的地区”等等。我们要问：毛主席亲自树的大庆，竟让你们说成这样，你们的矛头指向哪里去了？

4. 本来是大庆工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欺骗中国人民解放军，玷污的解放军，而你们却硬说是“专政对敌人一点不强”“大庆驻军帮助窝藏黑材料”“对抗中央军委指示。”你们为什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一小撮混蛋，你们听着：任何人想用任何借口，反毛泽东思想，发大庆道路的绝对办不到，你们反大庆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被我们大庆革命造反派抓住了，想缩是缩不了的，想滑是滑不走的，还是彻底交待你们的罪行吧！否则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谁反对学大庆，谁就没有好下场！

学大庆战斗队一小撮人反大庆道路罪责难逃！（口号略）

大庆革命造反派代表 1967. 3. 19

“学”大庆，还是反大庆？！

——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学大庆战斗队的《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否定大庆、否定大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否定二十三条及四清成果，从而全面否定毛主席近四年来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在这个时候，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抛出了“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这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此，必须彻底批判。

一、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

大庆是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起家的。大庆会战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大会战的指导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原则。大庆油田的工人阶级在我国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乘机进行经济封锁的严重关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打最困难的仗，用极短的时间拿下闻名世界的大油田，根本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做到了自给自足。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学大庆战斗队说：“余秋里破坏了战略部署，集中全部兵马打大庆油田，是有个人目的的。”他们把大庆会战污蔑为余秋里个人野心。这纯粹是无视历史、无视石油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及全国人民、无视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决策的恶意诽谤。

学大庆战斗队为了达到它反毛泽东思想、反大庆道路的目的，无耻地造谣说：“大庆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指示，一般工人很少看报（没有报），又无广播”。事实是怎样的呢？大庆每个矿、科、室、队，每个基层单位都订一套报纸，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等。广大职工、家属还订阅大量报刊。这怎么能说大庆没有报，一般工人很少看报呢？至于广播，不但各指挥部、各矿有，在各交通要道、家属区也都有。钻井队长期在野外工作，为了能够及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每个班、组都备有一台收音机。大庆工人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这怎么能说是大庆无广播呢？你们的用心很明显，就是给大庆工人脸上抹黑。

从60年会战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院在大庆参加工作、实习和文化大革命的师生从未间断过，我们参加了大庆的各种大会、小会，每次在会上大庆职工都满怀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无限热爱，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竟说：“不喊毛主席万岁”。这是对大庆人的极大侮辱。

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反修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许学大庆战斗队玷污大庆这面红旗。

二、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大庆油田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是党领导的。大庆道路不是靠物资刺激，是靠突出政治，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大庆道路就是要大树特树，工业必须学大庆，这是毛主席指出的道路，这是最高指示。学大庆战斗队把大庆说成是：“大搞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我们问，你们还承不承认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三、不许给大庆这面红旗抹黑

学大庆战斗队在六六年十一月份到大庆混了二十多天，专门搜集大庆的阴暗面材料，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搜罗起来，如获至宝，肆意歪曲夸大。学大庆战斗队把大庆说成是“独立王国”“水牢遍地”“私造军火”“敌特活动猖獗”“公安部门无力”“解放军窝藏黑材料”“树假标兵”“工人只能规规矩矩”“大搞刘邓的东西”等。最后竟丧心病狂地说：“到了大庆就像到了与世隔绝的天地”。请看！还有什么更恶毒的语言没有用上呢？学大庆战斗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看不到光明，你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了你们的爱和憎。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学大庆战斗队不正是这样一小撮“资产阶级文艺家”吗？你们把大庆工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夸大为“大庆一贯就是白色恐怖”，把战备措施歪曲为阴谋叛乱，夸大敌特的力量，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应该大喝一声！不许你们胡作非为，不许你们给大庆这面红旗抹黑。

学大庆战斗队在六七年元月五日乘大庆展览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威逼康世恩（石油部副部长）索取有关我国石油工业的机密材料，大量抄录。你们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把我国石油工业的绝密材料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这种犯罪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大庆是毛主席树起来的一面红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将更加鲜艳，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敢否定大庆这面红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坚决消灭，决不手软！

红代会北石大庆公社《红尖兵》

【百年中国】

画说我的一生 (16)

上战场，枪一响……（下）

（1967年8月-10月）

刘海鸥



正是晚间，我带她在外贸局吃饭。那天正好伙食大改善，传说天山那边的羊因为大雪无处生存，牧民把羊赶下山来，两块钱一只大甩卖。外贸局买了一些便宜的羊，熬了一大锅羊肉面汤，每人油汪汪的一大碗，里面好几大块羊肉，每块都有半个拳头那么大。我吃了一两块，再也吃不下了，肉太肥，厚厚的一层膘。海燕忙说，你不吃给我。她把我的和她自己的肥羊肉都吃了，吃得满嘴流油，香得不得了。不知道她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

不敢让海燕在新疆久留，当晚我就弄了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把她送到车站，看她离开了这个鬼地方，真为她庆幸，不知道后来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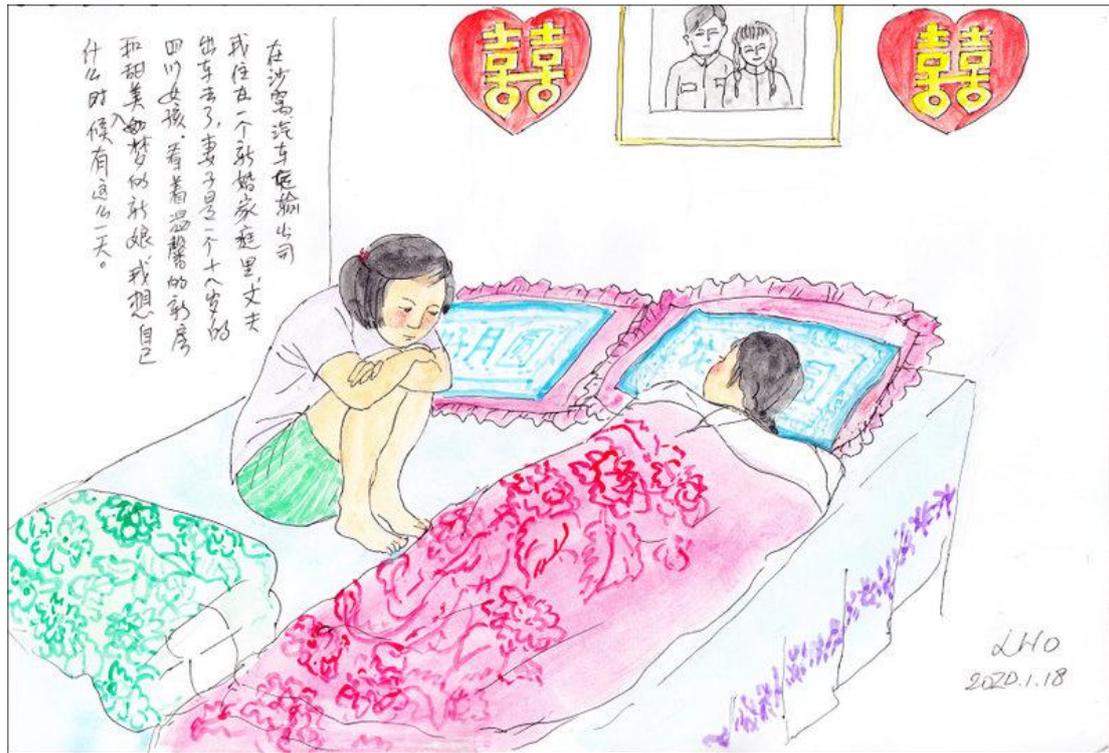
送走了海燕我还是不打算回家，继续留在新疆，我真是太年轻，不懂得父母为儿女操了多少心。



红二司派的人都躲起来了，在乌市的工作没发展开，我决定下专区县。倒不是想去发动群众，而是我一直对“下边”极有兴趣，只有了解了下边的生活，才能对社会及人生有真正的了解。我打算顺着乌伊公路往西调查沿线的区县，最终目标是伊宁。本来为的是看海燕，也是被伊犁那个边陲小城所吸引，海燕曾在信中做过那么多描述，她是那么喜爱那个地方。我准备下去的时候，海燕已经回京，但我仍然不打算改变路线。

克阳和一个科大学生已经离开乌市，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听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道路被封锁过不去，甚至被殴打，又回到乌市，然后她先回了北京。

外贸局的人帮我联系了卡车。一天的大清早，卡车来了，待上了车，只见高老师一个人在车上，问其他的人怎么没来，说在别的车上。车开不久，我发现往西去的车只有我们这一辆，我非常不高兴，知道这一定是他有意安排的，我一路上一句话也不和他说。



车子一路向西。晚上到达沙窝，住在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里。这里充满了恐慌的气氛。红二司派的人神色紧张地把我们关在屋子里，急促小声地向我们述说老保的势力有多猖狂，如何制造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们的人被捉去后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夜间他们悄悄把我带到一个年轻女人家，是新房，刷得雪白，被褥崭新。她的丈夫是运输司机，跑长途去了，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这女人小巧玲珑，是四川的农村人，年龄比我还小，还带着新娘子的鲜艳。她似乎对文革一无所知，只是一个劲怜悯地望着我说：“好可怜呀。”

我躺在炕上，想的是另一回事。我想，一对小夫妻住在这样一间暖和干净的小屋里，是多么惬意的事，当丈夫跑长途归来，小别如新婚，这小屋里该充满多么浪漫的气息。我突然对这么无尽无休的漂泊产生厌倦，我想回北京了。



第二天早上见到高老师，他说这里的造反派太紧张胆小了，让他简直哭笑不得。昨天夜里他被带到一个地洞里，大家蹲在那里（他的陕西口音说“东在那里”）大气不敢喘，就这样窝了半宿。深更半夜时又说有情况，摸黑偷偷转移到另一个什么地方，一晚简直没有睡觉。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吓唬自己，就像讲鬼故事，越讲越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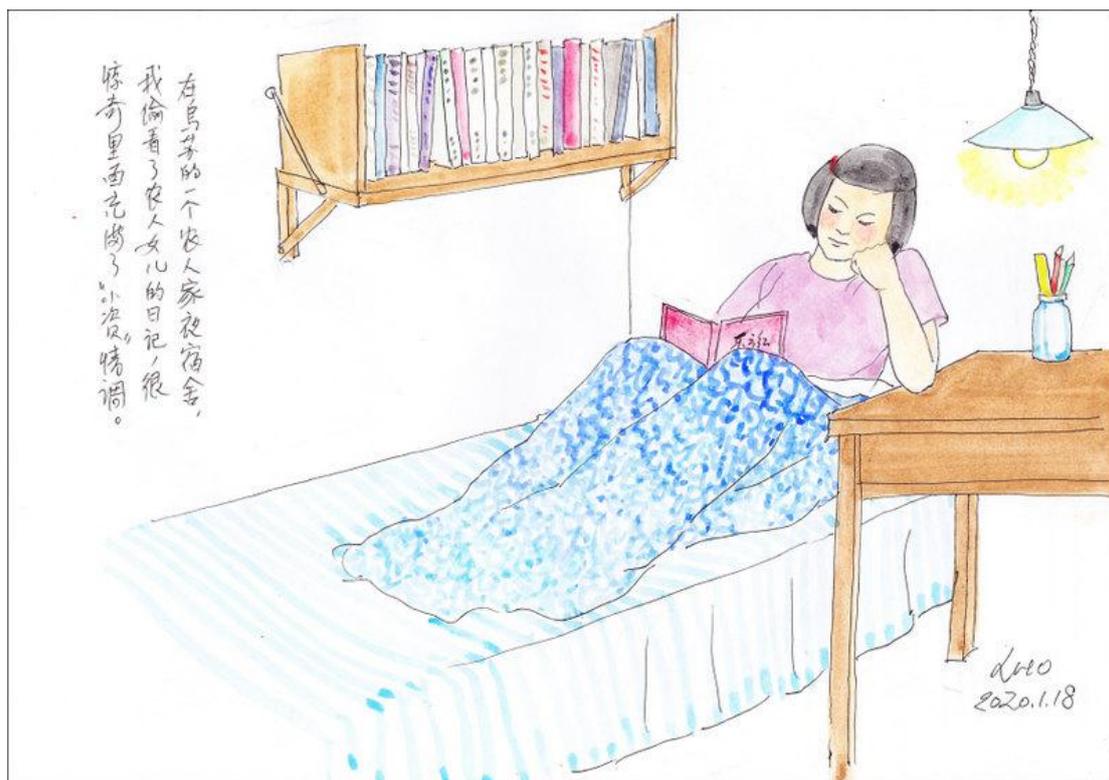
我和高老师一起在镇上转转，一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批评此地的造反派。他说，要革命首先就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如果只看到对方的力量强大，自己先胆怯了，那么自己就已经首先把自己打败了。革命者必须是强者。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有道理有气魄，心里暗暗佩服了他几分，联想兰州火车站的夜晚，他确实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下一站是到农七师，我们在厂部奎屯落脚。晚上和造反派的座谈，高老师讲全国文革形势。返回驻地时，路上夜色漆黑，脚下的道路被大车轱辘压进去深深两道沟，高低不平。路旁的两排白杨高耸入天，在夜幕的衬托下只见黑色树影，如两排黑色高墙，让夜显得更黑。偶尔传来鸟雀扑簌簌飞离的声音，或树叶的沙沙声。想起我当年坚决要来新疆，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不禁感叹幸亏没来，想起海燕还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心里疼痛。

晚上住在上海女知青的宿舍，她们围住我问长问短。这些女青年都是高中毕业由于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而来支边的，在此已经呆了好几年了。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由于闭塞，她们见了大城市来的人热情之极，对我简直是羡慕和崇拜的样子。她们的屋子虽狭小，却十分干净整齐，墙上贴着一些小资味道又不过分的小装饰画，床头有饼干盒子，或玻璃瓶子装着各种上海小零食。女青年的毛衣都是旧毛线结成，但是袖口领口是新毛线，罩上外衣，露出领口袖口，看上去穿的是一件新毛衣。毛衣的领口翻出花色雅致的衬衣领子，其实他们穿的是用带子连接在腋下的假领子。想到她们生活在边陲，劳动在大田，前景迷茫，还想尽办法展示自己的美丽，我心中为她们感到凄凉无望，想起同样爱美的海燕，更是难受。

离开农七师时，造反派送给我们一个大镜框，里面是毛主席标准像。我们只有恭恭敬敬捧过来，随身带上。我心里觉得抬着这么大一个镜框到处走很不方便。



再一天我们到达乌苏，这里也是一派失败主义情绪。造反派躲躲藏藏，老保耀武扬威。到达乌苏已是夜晚。我们被带到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个架子，攀援着瓜类的植物，成了一个自然的凉棚。院里有一间房子，房子旁边还有加建的一个小屋。主人是一对母女，家中的男人常年在外工作。我们谈了几句，有人就把高老师领到什么地方睡觉去了。女孩去了朋友家睡觉，我住在女孩的屋里，就是正房边上的小屋。房间十分狭小，放了一张单人床，床架很高，旁边一张书桌。我最喜爱这种小而全的屋子，有一张舒服的床躺在上面看书到深夜，有多么惬意。

女孩床头的墙上，竟然还有一个自制的简单的书架，里面摆了一些不俗的书。想不到这个农村的女孩自己还有这般爱好。我浏览女孩的书籍，发现一个本子，翻开看看，是女孩的日记。完全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女孩的生活和思想，我偷偷地阅读了她的日记。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她的日记与我当时充满革命口号和思想总结批判改造的日记截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文革时代的人写的，日记中不断地诉说一个少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朦朦胧胧，非常的小资情调。其中多次提到生活的无趣，生命的无意义，流露着悲观的情绪。从日记中看，没有指向具体的事件，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我很惊异于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一个青春女孩竟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不管说什么，她日记的“真”使我看

到了活生生的一个人，想起近两年我的充满革命辞藻的日记，我对自己有些隐隐的厌恶。

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女孩。十六七岁，面貌十二分地娟秀端庄，身材颇长，皮肤细白。她很有礼貌，但是淡淡的，冷冷的，眉宇间有一丝忧郁。她既没有都市女孩的娇和傲，又没有农家姑娘的俗和朴，气质很特殊。我们很快离开乌苏，没有时间多接触这个女孩，但她的形象及日记中所涉心声深深地留在我心中，我开始改变了写日记的方式，直视并记录自己的真实想法。



从乌苏往西的公路各关口被保守派把持，二司的司机谁也不敢冒险闯关，再说到伊犁要办边境证，十分不易搞到。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愿意再单独跟高老师行走了，一路上我总觉得接待我们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在这些偏远闭塞的地方，人们对这样两个游方的孤男寡女更会浮想联翩。我决定打道回府。

回去时只有去沙湾的车，我们在沙湾运输站一个工人家落脚，等待回乌市的过路车。工人姓索，似乎认识所有过往车辆的司机。他有个女儿十四五岁，叫索新芳。

索家做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老索说，当天的车都过完了，只有等第二天。我非常不情愿，一旦决定回去，就立刻觉得归心似箭。老索十分谨慎，不敢让我们在屋子里露面，把我和高老师带到一个地窝子躲藏，索新芳一直陪着我们，

和我聊家常。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憨憨地没有心机，她也要跟我们上乌鲁木齐她姑妈家。我回京后还给她写过信，寄过东西。

幸运的是不久老索通知我们有一辆去乌市的卡车将通过，我和索新芳跑到路口等她爸爸截车，买了一毛钱一杯的瓜子，两人嗑着。车子来了，可是只能带两个人，高老师让我们俩先走。我和小索高兴地上车，坐在驾驶舱里。小索挨着司机，我靠窗坐。不久小索要和我换位子，换了座位，我才发现司机在打轮时，右臂有意无意在加大幅度，胳膊正好碰到我的胸口，我也不好意思出声。有办法了，那不是有一个毛主席相框吗，我把它抱在胸前，你要碰就去碰毛老人家吧。



到了乌市下车，我们向司机道了谢，除了大幅度打轮，司机对我们基本上好的。临走司机吭吭哧哧了一阵，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把那个装毛主席像的大镜框送给他。我正愁这玩意儿拿不好拿，放没地放呢，乐得顺水人情送给了他，他笑得简直开了花，一个劲地感谢。我心中也有些不解，我差点要把他归到流氓坏人那一类了，他怎么对毛主席还是那么热爱呢？！



回到乌市已是晚间，外贸局的房子空空荡荡，科大的学生全走光了。我一会儿也不想多待，当下就收拾了东西，以红卫兵记者站的名义在火车站直接搞到一张车票，没有收钱（一两个月后，账单寄到师院附中的革委会，六十八元，我老老实实付了车票钱，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当天就坐火车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白净的男人，不久他就和我聊起天来。其实只是他聊，满肚子的牢骚，听口气像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干部。他讲生产如何遭到破坏，国家财产如何被人据为己有，人心如何江河日下，社会治安如何混乱，人们生活如何艰难……他一口气谈了几个小时，并非侃侃而谈，而是声音低沉的诉说，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焦虑及对现实的迷惘。我没想到在这样的大时代还有人发出这样的哀鸣，心里不完全赞同，但还是安静地听着，因为他是那么忧虑和悲伤，他所说的那些话肯定不敢和他的同事朋友说，只能对一个陌路者发泄一下，而且对象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我听着，渐渐困了，一觉醒来，那人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深夜在哪一站下了车。但他的沉痛忧伤说话口气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回到北京，科大赴疆的战友们常聚会。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做了新疆羊肉抓饭、包羊肉饺子，虽然做不出地道的新疆味道，但还是吃得热热闹闹。我们还和他们以及从新疆带回来的女孩子一起游览北京各个风景区。

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香山游玩，在“鬼见愁”上大家合影。上来一个高个洋人，身穿中山装。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们说：“我是法国人，到中国来学习革命。”他很想和我们这些“红卫兵”照一张相片，我们欣然同意。其实只有一个人带着新疆红二司造反兵团的袖章（照片中的女孩除了我都是从新疆带来的）。

照完后我就忘记了此事。几年后我竟从另外一个途径得到了这张照片。

海燕的同学华卫民，妈妈是法国人，华在中国长大，常到我家玩，文革后回了法国，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看相册，见到了我们在“鬼见愁”上的那张照片。她很惊奇地发现我也在照片上，说：“这不是海鸥吗，我认识她。”于是那个法国青年就请她把照片转交给我。几年以后，华回中国，这张照片终于到了我的手里。世界上总有这么样的巧事，这次巧得跨国了。

1968年全国的武斗更加激烈，形成大规模的内战。但是我没有机会再出去了，学校通知我们代培教师的正式分配方案已经下来。❏

【评论】

文艺女兵的革命与爱情

——刘燕瑾 1943—1947 年日记解读

石岩

母亲刘燕瑾 1943 年到 1947 年的日记在以《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为名出版之前，王端阳把打印本寄给诗人邵燕祥，本希望他能随便翻翻，然后“写上几百字，表示他认识我妈就行了”，没想到邵燕祥不但通读一遍，并且写来一篇长序。

“这是一本《爱经》，中国的，四十年代的，敌后游击区的”，邵燕祥在序言中说。

“爱经”的书写者刘燕瑾曾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女兵。邵燕祥结识“大刘”是在 1960 年代。在孙维世导演的话剧《叶尔绍夫兄弟》中，邵燕祥任编剧，“大刘”扮演女工程师“伊斯科拉”（俄语音译，意为火花），她在邵燕祥的记忆中长久留下“火花”的印象。

2012 年，刘燕瑾去世，长子王端阳从母亲的遗物中发现四本日记、八封情书和两张照片。情书和照片是大导演凌子风寄来的。那时，凌子风的名字是凌风。信、日记和照片都用包袱皮包着——这种冀中农村收纳物品的习惯，刘燕瑾保持了一生。日记本是自钉的，其中三本小的，用“打褶裯”的方法做了“八路灰”的布封面，那本大的是极漂亮的花布封面。翻开这个本子，其中一页夹着一片七十多年前的青蒿，蓝色的油笔在这一页写着：

反省应该有重点，反省应该抓着要害，这样才能够深刻，这样别人才能够满意……那么对于我，我坚决应该清算（清算）我的男女关系。

“这是纯粹私人的日记，没有空话套话，她也很少写当时的大事儿，她写的都是自己的感受。”王端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数过，母亲的日记里有二十几处写到月亮，每一处的描写都不一样。母亲的感受力让王端阳吃惊，更让他吃惊

的是：她1940年代就看了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1950年代，这本书和电影曾反复被批、被禁，王端阳直到文革才一睹这部“禁书”的真容。

厚厚一摞日记让过了耳顺之年的王端阳与陌生的、年轻的母亲相遇。

刘燕瑾，满族正黄旗人，生于北京，抗战爆发前，就读于北京女二中。在中学，她得到的一件礼物是一柄扇子，扇面当中是大大的篆字“健而美”，四旁的小字写的是：“繁华不必慕……”“弱不禁风的女性已是时代之落伍者，新的女性要生活简朴，身体健康，并努力从事于妇女解放运动……”（在1944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追忆）

1935年，刘燕瑾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王端阳收集的老照片中，母亲穿着洋装，与黄敬、张瑞芳们到北京郊区宣传抗日，演《放下你的鞭子》、跳狐步舞。

卢沟桥事变后，刘燕瑾在二十九军做军医的父亲失踪。刘家的经济条件急转直下。1938年，在冀中军区卫生部工作的二叔把刘燕瑾带到军中。1939年，刘燕瑾调入冀中军区直属的火线剧社并加入中共。从1943年到1947年，刘燕瑾写了5年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她20岁到24岁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恋爱加整风。

“像白杨树一样的人”

夜里做了一个奇异的梦：许多的青年，强壮的勇敢的青年，在拼命的追逐着我。在无际的平原上，我飞快的跑着，后边有一个人在追逐着我。在辽阔的海洋上，我像生了翅膀一样翱翔着，后面也有人在追赶着我。在无边的沙漠中我跋涉着，后面也有人使我喘不过一口气来……（1944年5月25日）

现实潜入梦境。在1940年代的火线剧社，刘燕瑾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演员。走在街上，被“许多斜度不同距离不同的视线注视”，她知道自己“并不美丽，只是健康，健康得快要崩裂了”（1946年5月18日日记）。在剧社，她的“代名词”是“夏天”，人们说她有“星一样撩人的眼睛”（1944年10月11日）。

火线剧社盛时一百五十人，困难时期几十人，在这个不大的集体中，刘燕瑾的追求者够组建一个班。这让她骄傲也苦恼：

我感激你们，感谢爱我的人，泪都流出来了，请恕我不能千篇一律的爱你们。如果“人”能允许有几个爱人，而爱人与爱人之间也能心心相印，毫无一种怀疑嫉妒的心里，那不是更好吗……

她希望：“许多人来帮助我，特别是在心灵上一致的人，能沟通的人，在灵魂上纯洁完美的人，在气质上应该像一棵白杨树一样的人。”

在日记里，她以姓名缩写代替大多数追求者，经常被提到、有名有姓的有三位：黄枫、凌风、王林。

王端阳查证：黄枫是火线剧社的男演员，因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而抗日。

曾经有一个时期，刘燕瑾和黄枫视彼此为“思想爱人”，两人定期交换诗和日记。每当刘燕瑾“违反组织及群众的意志”后，黄枫“都要在背后歌颂一番”：“倔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主见的人才是真正没出息”“要生活得更健康，像狮子，像虎豹”。

在1940年代的抗日根据地，我行我素意味着落后。年轻的刘燕瑾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帮助落后的黄枫，后来，这成为她的罪状之一：组织的力量比个人强大；一个人只要他是要进步的，在革命的队伍里，到处都有人来帮助他，照顾他。

在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中，黄枫被俘。《晋察冀文艺丛书之二——敌后的文艺队伍》有这样的记述：黄枫被俘后，“坚不指认同志”，数十日后与其他被俘战友“皆被地下组织营救出狱”。

刘燕瑾一度以为黄枫已牺牲，她在日记中为他写了一首小诗：“过去，我们为着友谊的好，曾受尽了人们的一一嫉妒、讽刺、辱骂……”

1943年4月21日，黄枫突然返回部队。刘燕瑾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日情景：“离北洪城差不多只有一里地了，在一个小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蔚蓝色的影子，越来越近了。突然向我们扑了过来，有一股热气冲到了我的嗓子里，我说不出一句话，一双火热的手伸到我面前，我真不知该怎样好了。”

接连几天，黄枫与心爱的姑娘竟夜长谈。刘燕瑾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在村后土坡上，园子里，河边，草场上，谈到了半夜。月亮是那样圆而亮，像一个水

晶体那样洁净。我非常愉快，完全被一种爱的烦恼所缭绕着了”“夜像死水一样静，月亮已经变成了椭圆形，我和我的朋友在野外谈判着一件最纯洁的事情”——之所以要“谈判”，是因为凌风已闯入她的生活。

1941年，火线剧社要排演“光听说过而未亲见的话剧《日出》”。冀中没排过这么大型的话剧，找不到合适的导演，有人提议请“西战团”的凌风：他刚从上海来，见过大世面。凌风不负众望，他用花布在霸县胜芳镇的冀中军区礼堂堆砌出1930年代天津卫的华丽，沙发、茶几、地灯、墙画、帷幔一应俱全。烫着飞机头、穿着花旗袍和高跟鞋的刘燕瑾在剧中扮演顾八奶奶。

战地剧社流动演出，很多时候近乎草台班，真正在剧场里演出的机会不多。刘燕瑾在1946年的日记中，把参演控诉国民党政权的大戏《血泪仇》称作自己“自演戏以来的第二次剧场生活”。她认为，自己的“第一次剧场生活是在1943年在边区议会大礼堂”。当时，冀中军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凌风在会议召开期间正式向刘燕瑾求爱。一年之后，刘燕瑾还在日记中回味当日情景：“屋外下着雪，天上没有一个星，礼堂里没有一盏灯，礼堂里的炉火正烧得通红……另外就是你的两颗明亮的眼睛。”

“我二十年中糟蹋的粮食，还不如叫牲口吃了”

凌风经常出现在刘燕瑾的梦中，她在1943年3月16日的日记写道：“昨夜梦见了凌风，他从一个两旁长着白杨树的山坡上，穿着一身湛蓝的外衣，孩子一般的跑了下来，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他的脸上第一次浮起了褐色的兵士的泛潮。就在这一秒钟，我陶醉在一股热与甜的情感里了。我没有讲话，因为还有急的工作等着我，我离开他了，不远，在背后传来了钢样的声音：‘XX待会我和你谈谈。’”

那“钢样”的声音来自指导员。1942年，日军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让冀中军区的整风推迟了一年。1943年4月底，整风山雨欲来，刘燕瑾被政治指导员数度约谈。她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感情经历，“都说了，一切的事情全讲了”，指导员批评她：“对他们的诱惑或以‘朋友’为掩护来进行其他活动都是不应该的。”

压力之下，刘燕瑾开始吸烟。几天之后，她决定学习沉默：“沉默对于一个青年大概是最痛苦的事吧！可是我却不能不这样做……（1943年5月6日）。”

但这种沉默很快就遭到了批判，人们认为那意味着苦闷、烦恼、不愉快。

傍晚行军的路上，刘燕瑾看着天边浮想联翩：

第一个跳出天幕的星星，顽皮的向我眨着眼，一会儿，又一个像用手偷偷的拉开那无边的帷幔一样向我眯缝着眼微笑着，一会儿，又出来两个、三个……于是慢慢地一小组一小组的全跳出来了……都对我眨着眼微笑着，最后……全天的星星都向我大笑了……我于是像被一群群哄笑着我的人包围了一样，带着一种不好意思的心情，害羞样的慢慢地低下了头，再也不敢抬起来了。我默默的走着我自己的路，我在星星的包围和监视下，偷偷地前进着。（1943年6月2日）

在刘燕瑾的日记中，火线剧社的整风自始至终与整顿“男女关系”交织在一起。进入1943年6月，剧社每晚搜山，“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高潮了，甚至听说还有‘野合’的”。夜里，社长查铺，指导员则在会上说：不管已经历史注册，或正在进行的，或第一、二、三者，或准备演压轴大戏的，或主角、配角，全都应该立刻停止活动，把全副精力放到工作上、整风上，否则论法定罪。”（1943年6月9日）

会后，刘燕瑾向黄枫宣布了“死刑”。黄枫缠绵悱恻地表示：“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爱你，我将离开你……而漂泊去……”刘燕瑾觉得自己该痛哭一场，“但到处都是人，我是绝不甘心让别人看作一个绝望或没有出息的女人的，像歌忒一样。”（1943年6月11日、12日）

歌忒是她当时在看的《冰岛渔夫》的女主角。在这部19世纪的法国小说里，对爱情的渴望和禁欲主义的说教并存。同一时期，她在日记本中大段抄录《原野》中，金子向仇虎表白的台词。

剧社开始批判“恋爱至上主义”，刘燕瑾心里翻滚着自责、忏悔，衣服脏得全有味了，也不愿意洗（1943年6月14日日记）。行军途中，狂风暴雨突如其来，她觉得乱射下来的雨丝像玻璃条。（1943年6月28日—29日）

在支部大会上，她被要求做彻底的个人反省。她决定“把自己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无条件暴露给党”。她谴责自己：“我二十年中糟蹋的粮食，还不如叫牲口吃了。”（1943年6月20到23日）

在肃杀的6月的最后一天，刘燕瑾接到心上人凌风一个月之前从雁北寄来的

信，她从信中感受到一丝新鲜的气息：“那里仍然在严冬，生活是异乡风味”。1943年的日记到这天戛然而止。剩下6个月的日记，在1946年被刘燕瑾烧毁。

“兴奋得、敬佩得要给毛主席叩头”

1944年3月10日，火线剧社的整风正式开始了，“一天7小时的学习时间”“很多的从来就隐瞒着的问题全坦白出来了”，墙报大大地增加了篇幅（1944年3月22日）。

随着整风的深入，数次在大会小会上“脱裤子、割尾巴”的刘燕瑾被委以重任：在《前线》中扮演唯一的女性角色护士玛露霞。

《前线》是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作品，创作于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其中有两个人物：仗着布尔什维克的老资格固步自封，骄傲自大的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脱离实际，捕风捉影的记者客里空。

1944年，毛泽东把《前线》剧本推荐给《解放日报》并亲自撰写社论，阐释戈尔洛夫的反面教育意义：没有头等的军事能力，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对这样的人必须教育，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通知，要求将各根据地改编的《前线》剧本和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翻印，作为整风的学习材料，在干部中散发，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

为排演《前线》，冀中军区花了大价钱。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后来成为刘燕瑾丈夫的王林在同时期的日记中记录，《前线》的舞美服装费用在三十万到四十万边币之间。

出演这样一出全军区瞩目的大戏，刘燕瑾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从1944年7月30日到8月24日，《前线》成为她日记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她在理性上知道玛露霞应该“有着非常饱满的爱国热情”“布尔什维克钢的意志”“潇洒、愉快、说笑自如的风度”“健康的丰满的美丽的身体”。但一旦进入排练场，她立刻感到自己对剧本的了解实在有限，玛露霞的身体、声音、风度“不用说没见过，就是听说过的也太少”。倒是对玛露霞热爱的男主角瓦西亚，刘燕瑾的幻想更加具体：

他有着《第四十一个》里面的白军上尉那样“神秘的引诱人的碧蓝碧蓝的眼睛”，有着《星花》主人公的“飞鸟一样的眉毛及大理石一样的背脊”，他有扬恩一样被“大海所抚育的健壮的身体”，还要有炮兵谢明一样高超的技能和对卫国战争必胜的信心——这其中，除了扬恩出于法国小说《冰岛渔夫》，其他几位各有千秋的男神都出自苏联小说。

进入1944年，苏俄文艺作品在刘燕瑾的阅读比例中显著增加：《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穿军衣的姑娘》、屠格涅夫的小说、《目击记》、苏联女神枪手巴芙里琴珂的自述、《新世纪的曙光》《望穿秋水》《日日夜夜》……《目击记》让她叹服：作家的党性表现及阶级立场的掌握，“没有一个空隙能让你想到其他的立场上，它的每个字都高度地证明着无产阶级祖国的力量。”

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激起刘燕瑾对领袖的由衷崇拜：“兴奋的、敬佩的要给毛主席叩头了”（1944年10月9日）。

1944年10月，冀中农村“反国特”的运动如火如荼：“到他们家砸窗户砸门，喊口号唱歌，把那些未曾坦白的‘国特’牵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牵到河沟里给他洗澡，牵到沙滩里给他打滚，往他们身上抹屎，甚至把‘破鞋’脱了衣服，用沙土来埋”——这一切曾让刘燕瑾觉得过分，但读了《湖南农民运动报告》，怀疑消失得无影无踪：抗日战争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毛泽东的思想，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1944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让我举起双手高呼一声：毛泽东思想万岁！”

组织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威慑。刘燕瑾把组织比作“保姆”：“生活中的一切全等待着公家，冷着饿着，反正组织上你得给我想办法，我自己就是把这样一个人交给你了”。在组织的怀抱中栉风沐雨，刘燕瑾发现自己的容貌发生了变化，她的额头上添了皱纹，颧骨微微地露出来，“凹陷很深的眼睛闪动着金属一样的光泽”。

有望彻底过关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1944年12月，在连续三天的讨论会上，刘燕瑾彻底清算了她“从历史发展以来的一切男女关系”，其荦荦大者包括：“恋爱的游击主义，杯水的解渴式的盲目的冒险”“爱一些不该爱的人，甚至发生kiss关系”“几次在恋爱上违反政治原则（对象全是非党员）”。最后，她最后给自己

的“错误”定调：以“浪漫的放荡不羁的心理”和“轻浮的风骚的调情的作风”“扰乱了周围的男人，激动了他们的情绪的不安与混乱，实际上起到敌特的破坏作用，因为敌人的桃色间谍往往采取这种手段。”

把自己定性为“桃色间谍”的次日清晨，刘燕瑾带着“新我斗争胜利”的满心喜悦，“冒着鱼白色的朦胧跑出村子，跑到了白洋淀旷阔的冰凌上”，来回滑冰。北风吹动她的蓝头巾，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她滑过去的地方留下明显的冰痕。因为技术不高，女演员接连不断地跌倒、爬起，这让她心生感慨：这不就像人生的旅程吗？

不是鸳鸯来革命，而是革命配鸳鸯

整个1945年的上半年，爱情的困扰再也没有出现在刘燕瑾的日记中。读完了苏联小说《新世纪的曙光》，她对女革命者安娜·卡苏亚诺娃钦佩有加。她在日记中抄录安娜的语录：“生命不是我自己的，是人民大众的，我一定要在很高代价和某种目的之下才出卖我的生命。”

7月14日，刘燕瑾在日记中描绘她理想中的男性：“心在流血，然而表面上看不出来，既高傲而又忧悒。可是十分坚强，像铁一样的——人。”

然而，夜里听到孤单的布谷鸟的叫声“像一种玻璃或锉锯的声音”“好像把安静的大地一撕而破成了两半，并且还向南无情的撕下去”，刘燕瑾的心还是会一阵悸动，她觉得布谷鸟叫的是“光棍打锄”“光棍好苦”。

1945年8月11日，抗战胜利的消息突然传来，“肉铺掌柜忙得汗珠在身上汇合成河流”，家家闹着要包饺子。冀中军区接到命令，向天津挺进。火线剧社连续十天急行军，赶到山西大同得胜口时，传来接收天津受阻的消息，消息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总的来说“向着胜利的光明的方向急滚”。10月下旬，剧社行进到河北，门外的大路上每天都有从延安出发、奔赴北方的部队。刘燕瑾盼望听到凌风的消息，11月10日，有人告诉她：经组织撮合，凌风已在一年前的“三八”节与一位老红军的遗孀结婚。

爱情死了，运动却并没有结束。1946年春天，火线剧社开始“群众自发的斗山头运动”。

群众认为，火线剧社像中国的时局一样，分出了中央系、地方系、杂牌系、

中央社、CC社。其实所谓的“山头”常常只是生活作风、生活趣味的差异。刘燕瑾把新生队女兵的分歧当作笑话写在日记里：农村兵赤身裸体地在大柜上比大腿，一丝不挂地在炕上“下仙”“请仙”，男同志闯进去也不以为意；城市兵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

大会小会，人们赤诚相见、痛哭流涕，把自我和隐私置于砧板之上。轮到刘燕瑾发言那天，鸡刚叫头遍，她就再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打小鼓一样，止不住地跳”“思谋着怎样准备发言提纲，怎样补充例子，才能使大家满意而不至再受打击。”

但群众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她的检讨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把她列为“第三批战犯”；她已经被批倒批臭的恋爱问题再次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一位严肃的热心人为她制定了“三个八月十五”计划：今年八月十五恋爱，明年八月十五举行婚礼，后年八月十五怀上小孩。（1946年5月7日日记）

组织长驱直入私生活领域。刘燕瑾终于觉悟：不是鸳鸯来革命，而是革命配鸳鸯（1946年7月27日记）。恰在此时，一直关注她的王林发起猛烈攻势，刘燕瑾接受了这位比自己年长14岁的追求者。早前，她曾以“体力体格不是她所理想的，唯恐将来的夫妇生活不济”以及年岁问题拒绝他。（王林1945年9月13日）

1946年8月21日，王林和刘燕瑾向组织提交了结婚报告。8月24日下午两点，他们举行了婚礼。两天以后，同志们对新妇开起玩笑：“怎么样啊？”“呛着了吗？”“新的生活过得很愉快吧！”“坏了，脸色黄多了！”“可平常也打起盹来了，你多咱这样疲乏过啊！”“再过两星期王林就成了甘地了。”

至此，“整风”在刘燕瑾身上的变奏似乎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尾，但一切远未结束。刘燕瑾在1947年的日记本里抄录了群众给她提的意见以及她本人针对这些意见的反省。相比写给自己的日记，刘燕瑾在大会小会上发言要残酷许多，她说自己的“乱爱”是“淫乱思想的反映”，她把自己与剧团男演员朦胧的爱情和友情统称为“破鞋行为”。

而热心群众对她的批评帮助甚至持续到她结了婚、成了“干属（干部家属）”、做了母亲之后，所批判的问题包括她吃奎宁打胎（“打胎是反党行为”，是“反抗组织，威胁组织，推脱责任”）；包括她的丈夫为什么一个星期给她写一封信（“非

一个星期来一封信不行吗？他工作是否忙呢？”）

不读演义只读志

对王端阳来说，阅读母亲的日记是人生第二次重要的发现之旅，第一次发现之旅是在2006年读到父亲的遗物。那年，两位妹妹决定卖掉父亲在天津的房子，清理旧物时，她们发现了父亲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他的文稿和几十年写的检查。

王端阳翻检故纸，最先被他注意到的是陈企霞（1950年代任《文艺报》副总编辑，1955年与丁玲一起被确定为“丁陈反革命集团”）当点批判父亲小说《腹地》的文章。

《腹地》是在“五一大扫荡”的刺刀下偷偷完成的小说，自1945年问世就一直命运多舛。1949年之后，王林对它的修改持续了三十年。1970年代末，他让爱好文艺的儿子端阳和克平阅读自己最新版改稿。长子端阳实在读不下去，父亲的文字空洞、乏味、充满各种高大全，他向父亲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不耐烦，父亲勃然大怒。

2006年读陈企霞的批判文章，王端阳发现：以今天的眼光，所有被陈企霞批判的都是对的和好的，再读1949年版的《腹地》，王端阳对父亲的看法完全改变——从少年时代起，他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二三流的作家”，但在此番重读《腹地》时，他却发现了它的价值。

王端阳扎进故纸堆，父母亲的日记、文集、照片，他自己的“红卫兵日记”“北大荒日记”“云南前线日记”……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了一副对联：“年来渐识草根味，不读演义只读志”。他和弟、妹议定：母亲的日记不删一字、原汁原味出版。📖

【序跋】

《国家首脑终身制》序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纽约 Columbia 大学政治学教授)



严家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也是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政治学者。那是说，他把政治看作一个要用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索的学科，而不看作教条和宣传。作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学的先行者，他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前景树立了一种模式。虽然严现在被迫流亡，但他的学术模式仍然影响许多中国从事政治学的学者。当然，这不包括政党建立在学者之上的学术权威，而是那些想了解政治生活在中国内外如何

真正运作的认真的教师和学者。

一些中国当代的优秀年轻政治学家，使用定量数据 (quantitative data) 或博弈论 (game theory) 来检验微观行为理论 (theories of micro-behavior)。严家祺的政治学模式反映了一些早期而至今仍然必要的方法。他把人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整体历史，作为研究人类政治行为数据的来源。他明确并仔细地界定了“权力”和“权利”等概念。他探讨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推动政治调研的重大问题，例如政治秩序和混乱的根源。他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写作，以期普及至与政治利害相关的群众。由于严家祺的学识广博，文字清晰，没有人比他更能对中国人传达如此丰富的体验，即人类从各世纪和全球获取的诸多政治组织形式及政治理论。

严家祺最为关注的，是自西风东渐以来中国思想家面对的核心问题：什么的政治形式最适合中国？该是君主制？一个宪政共和国？作为民主政体过渡时期的一党专政（所谓“训政主义”）？还是一个声称技术官僚统治的一党专政国家？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该如何自己定位：一个帝国、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

还是一个联邦制度？领袖们设计政策时：该依照意识形态的原则、根据某种技术专家治国论（technocratic reason）的形式、或通过实际的实验来选择最有效的政策？

严家祺探索历史得出了一个有力的答案：独裁不是一种好的政府形式。权力过度集中，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扭曲了统治者的个性，导致（权力）滥用，也破坏了政治制度从失败中调节和适应新挑战的能力。

严家祺原本专业物理和数学，但在1978年改革开始时期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著名文章（参看本书的附录一《三个法庭——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访问记》），以成熟政治学者的姿态闪耀登场。他在假想中访问三个历史法庭——宗教（17世纪教皇法院），理性（法国启蒙运动）和实践（邓小平的中国）。此文通过事例，证明政治决策既不应该受意识形态教条、也不应该受抽象理论的指引，而是以科学态度来找出什么是实际可行，这是当时邓小平及其改革派非常欢迎的信息。其后严家祺与妻子高皋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详尽描述狂热的毛派，如何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严的另一名著（译者按：《联邦中国构想》）精心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应采取联邦政府形式，以便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维持它们（对中国）的忠诚。

本书附录二是严家祺在1980发表的文章《三种政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及共和政体考察记》，它解释了独裁，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差异。目前中国自由（派）思想的主流，即执政党行使权力时应遵守国家宪法，也肇端于严家祺。当然，要使一个宪政共和国运作，公众必须受到教育、具有政治觉悟并愿意遵守法律。这些是中国人民要满足的条件。

还有另一个条件：人民也必须决意尊重法律。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条件，因为法律和政治在某些方面是两个对立的体系。政治是关于权力的斗争，而法律是为权力的斗争设限。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一段时间，似乎中国拥有权力的人，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受的恐怖经验，会允许法律来限制他们的权力斗争。环绕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派重新引入了法律、法院和律师；允许公民起诉国家；为政府建立了文官制度；规范党内干部晋升的程序。

正如严家祺在他的若干著作中指出的那样，通过法律来驯服恶性政治的关键，

是一个适用于最强势领袖的有限任期制度。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或其他独裁者一样，在他去世前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那时在中国的其他高干和别处的独裁制度，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位直到死去或被清除。严家祺在他 1983 年的书《终身制和限任制》及其它著作中解释，为什么终身任期会危害国家。终身任期诱使领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使他们恐惧在放弃权力之后会发生什么；它削弱了其他的政治力量限制领袖权力的可能；它抑制了有才华年轻政治家的事业并驱使最有才华的人完全退出政治。终身任期也使官员和老百姓害怕说出真相，使最高领袖失去获取信息和意见的机会，以至迟早引发悲惨的错误。

邓小平同意严家祺的论点。他引入了基于年龄的政治领袖退休制度，并将国家主席职位只限两任写入 198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邓小平的固定退休年龄制度，演变为总书记这个最高职位的非正式两任期限。它是个渐进式制度化的系统，并非一蹴即至。因此，江泽民任总书记超过两个任期。当他把这个党的最高职位移交给胡锦涛时，仍保持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两年。他从正式的职位退休后，还在胡锦涛时期通过所谓上海帮的许多在职下属，施行很大的影响力。即便如此，有限任期的制度似乎也越来越被接受。2012 年，胡锦涛如期下台，习近平在 2012 - 2013 年如期顺利承接了三项（党、国家和军队）最高职位。

但现在限制任期的制度给扬弃了。2018 年 3 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内强力巩固权力，利用反腐运动清除所有竞争对手，任用自己人取代顶级军官，并于中共十九大在政治局中安置占主导数量的支持者之后，下令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修宪只是消除所有对习近平权力限制的过程中的最后一步而已。

这个危险的趋势促使严家祺在他重要的新书中回顾限制任期的问题。再次通过对人类历史和地理档案的搜索，严发现我们珍若拱璧的政治机构，从来是危机四伏。政治制度通过限制任期在抑制权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秩序混乱或腐败时，领袖们往往以恢复秩序为借口废除这各项限制。他们压制批评，监禁拥有独立观点的人，并压迫人才。

这种违反法治的行为，并不是建立秩序，反而引发更为剧烈的权力斗争。在（政治）系统中只有一个具实权的位置——只有在这一个位置，掌权者才可有真正

的影响并享受暂时安全的错觉。权力越集中，权力斗争就越来越剧烈，这包括对最高领袖看似强大时的消极抗拒和暗中损害；当他呈现弱势时，就是狠毒的继位斗争。如此，权力的集中逆转了法治，削弱而非强化宪法和国家。过度的权力，突显了掌权者的个性弱点，迟早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我钦佩严家祺对他的国家的责任感，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提出这个问题。我钦佩他对中国同胞们的信心，认为他们都热心公益，对真理感兴趣，并且愿意从严肃的学术中认识重要的教训。我钦佩他相信真正的政治学能够启发读者，并帮助公民将他们的国家纳入正轨。事实上，自从严家祺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撰写关于政治的文章以来，我一直欣赏他的作品。我很高兴能在1990年他到美国后认识他。我乐意向所有对如何治理中国这关键问题感兴趣的人推荐这本有启发性和思想丰富的书。☑

2018年7月4日于纽约

本文译者为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 The City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古兆中教授

【序跋】

《国家首脑终身制》

作者前言

严家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撰写《首脑论》时，我是站在平地上，仰望身在高处的首脑人物，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探索研究首脑的言行和生活。时过境迁，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失去了好奇心，也没有神秘感、不再仰视，而是平视，偶尔俯视，观察数以千计的首脑和他们的作为。首脑作为一个群体，在人性上与我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登上权力顶峰后，权力放大了他们品格中的优点，也放大了把他们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当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时，他的个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会给政治带来很大影响。在个人权力高于宪法和法律、在没有法治、迷信权力的国土上，不论科学怎样高度发展、

知识如何广泛传播，首脑人物的弱点和人性缺陷，都会造成普遍的人间灾难。

四十三年前的青年时代，我有一股攀登高峰的兴致，在鞍钢考察的间隙，与几位同事到鞍山市郊的千山山区，有意行走在没有道路的崇山峻岭中，攀登高峰。十五年前，我与妻子高皋，沿着旅游区的康庄大道攀登阿尔卑斯山。两次感受，迥然不同。四十三年前，当历尽艰难，登上一个高峰时，发现远方还有更高的山峰。在强风吹袭下，山顶上尤感寒冷、孤寂、无助、恐惧。当想返回平地时，竟然发现没有一条回头的道路。十五年前，当登上阿尔卑斯山高峰后，下山就像奥巴马总统离职一样轻松愉快。这使我想到了千山的崇山峻岭，就像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而阿尔卑斯山走的是“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当今世界上，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济没有现代化，而且政治也没有现代化，好容易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发现找不到一条回到平地的路径。2011年，利比亚首脑卡扎菲从权力顶峰跌落地面。他死亡的地点，竟是在一个废弃的下水道管道中。

在21世纪，许多国家都把“绝对权力”当猛兽一样关进了铁笼。良好的政治体制、首脑的任期制度，就是关闭猛兽的铁笼。《国家首脑终身制》这本书，是系统分析研究首脑任期制度的一本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首脑论》时，中国已普遍意识到毛泽东终身在位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中国开始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而当时亚非拉、加上东欧许多共和国的总统，任职不久，风华正茂。1981年，穆巴拉克（1928年生）担任了埃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正在大展宏图。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1942-2011年）受中国文革影响，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只保留“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称号，像毛泽东《语录》一样发行了一本由自己语录编辑的《绿皮书》。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1918-1989年）因文革期间到过中国，对神化领袖心驰神往，他回国后，就以毛泽东为榜样，他到各地视察，要安排民众倾城出动。罗马尼亚的报刊上几乎每天都刊登他的巨幅照片，过生日、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纷纷致贺电，以表示衷心拥护他的领导。每当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三十年以前，谁都预测不到齐奥塞斯库、穆巴拉克、卡扎菲他们终身在位会有怎样的下场。

现在我们都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在全国抗议风暴的第10天，在逃亡中

被士兵抓住。“罗马尼亚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就这样在临时审判中，弯着腰、低着头，被一支3人的行刑队执行了枪决。“万王之王”的卡扎菲在人民抗议下躲进没有电的废弃房子中，用蜡烛照明，最后在他家乡苏尔特的一个废弃下水管道中被揪了出来，头部和腹部遭到致命连环枪击身亡。到2011年8月15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连任已达30年，他躺在铁笼禁锢的一个提架上被抬入法庭，接受审判。当年10月23日，穆巴拉克看到他的老友卡扎菲被杀的电视新闻后，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并昏厥过去。

40年前，我曾用《终身制与限任制》为书名写过一本小册子。现在这本书《国家首脑终身制》是一本新书，是在40年来许多亚洲、非洲的国家，在共和制的名义下，恢复终身制的情况下写的。我的结论是，在不同政体下，终身制有不同的功能，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元首并非不可实行终身制，政府首脑也并非一定要有“连任届数”限制，在两种政体下是与民主政治兼容的。这本书也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分析研究“最高国家权力终身制”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人类的全部历史反复说明了，那些企图终身抓住“最高权力”的人的美好承诺，一次也没有实现。他们企图终身在位，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登峰造极、攫取大权前，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一颗“英雄”的“雄心”或“枭雄”的“野心”。他们的梦想、承诺如果实现了的话，也只是实现了他们个人追求荣耀显赫和掠夺财富的所谓理想，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发现，皇权或绝对权力是一头凶猛厉害的巨兽，这头巨兽会吞噬接近它的人，而驾驭这头巨兽的人，也会被咬得遍体鳞伤。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和进步，首先要实现政治现代化，把绝对权力关进铁笼，保障人权；其次要靠国家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和平民主自由法治的大环境中，发挥人的创造力、依靠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才能实现。

人所使用的概念，在数学上必须绝对精确，但在社会科学中，有许多模糊概念。在政治、经济领域，有些概念会被有意模糊化，让一些坏的事物用人们公认的好的词汇、概念去描述、定义它们。对不同国家的政体认定，常常会发生这方面的问题。在本书中，明确区分“名义”和“实际”两种情况，如“名义政体”和“实际政体”“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

还有一些概念，由于习惯用法与科学术语不同，如“英联邦”不是“联邦”，但习惯上用英联邦。本书为了区分习惯用法与科学术语，把一些习惯上使用的词汇或科学术语，联系起来说明。“权力”与“权利”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习惯上都说成“权”，在本书中，按中文的“权”字，把“权力”和“权利”联系在一起。在本书中相互联系而需要特别指出它们之间不同的概念还有：

两类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两类政体：名义政体和实际政体

两类王朝：家族王朝和非家族王朝

两类人权：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

两类目的：人权保障和社会公正

两种思潮：自由民主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

这本书还收进了一些有关“废除终身制”的文章，包括两篇幻想小说。一篇是1978年9月14日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的《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访问记》，这是为真理标准讨论而写的。这篇文章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肯定1976年天安门运动，是一种“试探”行为，因没有受到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文章发表后两个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在中国得到翻案。

另一篇是在北京《新时期》1979年创刊号上刊登的《专制·立宪·共和——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的考察记》，用政治幻想小说的形式，说明“必须废除最高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79年，在中国报刊上不可能公开批判专制制度，不能公开提倡废除终身制，就只能借幻想小说的形式，来谈“废除终身制”的必要性。从第一篇幻想小说发表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了。两篇幻想小说中幻想的“北京长安街上的巨型薄壳结构‘二次曲面’建筑物”“立体城市”“自动街道传送带”“人形机器人”、电视电话、自控轿车、互联网（原文用的词是“商业网络系统”）购物系统、可以存放50万册书的“电子书盒”、受控光合技术、合成食品工业、在城市上空的“人造太阳”，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但当我第二次乘着跨越时代的“时空飞艇”从北京经过巴黎到21世纪美国后，幻想小说中的“我”

已经回到1980年的北京，而实际上的“我”，也像幻想小说安排的那样，身不由己地从北京经过巴黎来到了美国。

1989年6月18日，我、高皋与另一位青年学者一起，在两位香港朋友的帮助下，从广州出发，经过东莞、樟木头，来到海边，乘上了真正的“水上飞艇”，在一个荒岛上度过一晚，6月19日第二天凌晨乘“水上飞艇”逃亡香港。¹到香港后，我准备在香港停留几个月就回北京，但在香港的第3天，在法国外交部和英国的安排下，英国驻港领事馆让我和高皋立即离开香港前往巴黎。²我奇怪的是，1989年我的实际行程怎么会与我在1979年幻想小说中描写的一样？

幻想小说描写的“我”，先到巴黎，后到伦敦的牛津街，再到美国华盛顿；在1989年后现实中的“我”也是先到巴黎，后到伦敦，再到美国华盛顿。不过在伦敦到的不是牛津街，而是牛津大学。幻想小说中的“我”从英国到过荷兰，现实中的“我”也到了荷兰。

在幻想小说中“我”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现实中的“我”在1989年11月20日，在“法国反种族主义组织”成立5周年庆祝时，我会见了密特朗总统，当天晚上法国一家电视台曾经播报。

写这两篇幻想小说时我还没有到过国外，并不知道伦敦有一条牛津街，更难想象凡尔赛宫内部情景。这两篇幻想小说中“我”的经历，怎么会与现实中的“我”在1989年6月后的经历相同呢？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我”，还停留在21世纪的美国。历时29年，没有乘上飞艇返回中国。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古兆中、美国格鲁门（Grumman Corporation）航空航天公司国际部中国部前主任保延昭、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张杰、美国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朱学渊的热心帮助，在这里向古兆中教授、保延昭先生、张杰博士和朱学渊博士表示感谢。对纽约Columbia大学Andrew J. Nathan（黎安友）教授为本书写序表示感谢。☞

¹ 参见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第21篇《在大亚湾荒岛上》一文，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

² 参与安排的法国官员有亚洲司司长马腾（Claude Martin，1944年生）、燕保罗（Paul Jean-Ortiz，1957-2014年）和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梦飞龙。1889年6月中国发生六四屠杀时，马腾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90-1993年担任法国驻华大使。他的回忆录《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 巴黎-北京-柏林》（《La diplomatie n'est pas un dîner de gala》）于2018年3月15号由法国l'Aube出版社出版发行。燕保罗（Paul Jean-Ortiz，1957-2014年）曾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奥朗德总统的外交顾问。梦飞龙在1989年是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后任法国驻上海市总领事。

【怀人】

中国青年报总编徐祝庆二三事

李大同

老徐和我前后脚进入报社。他是复旦大学67届的老大学生，1978年10月报社复刊前，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我则是1979年7月进入，是报社复刊后招聘的第一批驻站记者。老徐在本报退休，我也一样，等于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同事。

记得老徐先是在经济部当编辑，然后很快成为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我则是在地方记者、机动记者和编辑的轨迹上，两人几乎没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后来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轻同仁很有些畏惧他。李方曾经说过一个貌似笑话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凑巧电梯里只有老徐和他，气氛瞬间有些尴尬，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老徐搭讪，电梯运行时间显得格外长。李方终于忍耐不住了，没头没脑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干！”老徐反倒被吓了一跳。这个场景让我们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来大约是1984年，这时老徐已经是副总编辑，分管科学部。我则客串科学记者，为科学部打工。这一年电脑的汉语拼音输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电脑天才林才松与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周有光先生联袂完成的。我进入采访，费了牛劲儿，才算基本搞懂关于电脑的基本知识，周有光先生的讲解真是深入浅出。盛夏，那时连电扇还买不起，我大汗淋漓窝在家里写这篇报道，及至最终完成时已经超过万字。这是我的第二篇万字长稿。第一篇万字报道是钟沛璋任总编辑，老钟在签发稿件时有一句留言，“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见那时文字还不够成熟。这篇稿件写作时我感到比较自如了，最后一节甚至产生了节奏感。不过这么长的稿件通过率甚低，因为题材和文字都得压得住一个整版。稿件送老徐过审，没过一个小时办公室就把稿件送回来了，老徐已经签发，发稿单上啥批示都没有，翻开看，竟然一个字的改动、删节都没有。这么轻易一稿过关，是我没想到的，很不好意思，于是在送工厂发排前自己又仔细修改了一遍，删去一千多字。稿件迅速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称，这是记录周有光先生在拼音输入法上的重要贡献的唯一一篇详细报道。

1985年我开始担任科学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们开始熟悉起来。1986年9月末，我们开始了一场极大的冒险，将“11位大

企业负责人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作出基本否定评价”作为一版头条消息发表了。这条报道引起青年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和反弹，反弹意见我们同样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识分子与青年知识分子两军对垒的舆论局面。下一步怎么办？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开始讨论。第一组讨论按惯例放在一版，后续讨论转二版。讨论需要有个栏题，老徐建议叫“关于知识分子之我见”。晚上我将改定小样送总编室夜班时，觉得老徐的栏题不够打眼，于是给夜班留条，说老徐的栏题是什么，我建议用“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拟的栏题，自然，这是请示老徐后的结果。

我和老徐都没有想到，这场大讨论竟然持续了100天，并且始终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国巨大的反响和高度关注，甚至人民日报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也发出专论予以肯定。这期间的每一篇讨论稿都是我编好后送老徐审后发排，两人在他办公室对每一句话讨价还价，他想更稳妥一些，我则想更有锋芒和冲击力，最后我们总是互相妥协。

这场大讨论涉及了关于知识分子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潜台词当然是要大力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86年年底，政治氛围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甚嚣尘上。我们马不停蹄地加快刊发节奏，由原来两天一期改为一天一期，终于，在12月30日，对话录刊出了最后一期——这是这一天一版上，本报唯一的新闻产品，其他均为新华社通稿，其中一条是《北师大少数学生违法游行有人煽动》。半个月后，胡耀邦被迫辞职。那叫乌云压城啊，有高官说“对话录坏透了！”报社按上方指令，将对话录所有文章复制成三套材料，分送中宣部和团中央审查，看起来在劫难逃。又过了两个多月，有关方面下发的《报刊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集》里，经查阅，竟没有本报一条入选。鸡蛋里没有挑出骨头来，老徐把关有方，否则我大概率会栽进去。

20年后，在一次社庆茶话会上，老徐感慨地说：“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过时。”今年已经是对话录35周年过去了，微信群里一些群友听说我关于对话录有一个详细记录，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后，一位快80岁的四川老编辑说，我没看几页就回到了80年代，眼睛几次发热流泪……这些讨论，今天也发不出来！

1987年年初，老徐开始任总编辑，我转任学校教育部主任。上任头一年就

碰上一件怪事：部门同事去参加国家教委的新闻发布会，回来后我问有什么新闻，答曰教委说不要发任何报道。到场记者生气，问那叫我们过来干啥？回答说你们可以报道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一听就火了，写言论骂他！我立刻抓起电话向老徐汇报此事，说要写一篇言论批教委。如果换一个总编辑，多半会让我不要没事惹事，老徐只是迟疑了一下，“说些什么呢？”我说写好你看。言论中我援引了刚刚结束的十三大闭幕式上，赵紫阳总书记面对一群国外记者，把酒纵论天下事，毫无躲闪与做作，展示了中国政坛新风的例子，痛批“国务院某部门”的僵化与保守，标题就叫《不许发布新闻的新闻发布会》。老徐认真看过稿子，改了一两处，签发，第二天竟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原以为教委会打上门来问罪，没想到过了几天没动静，反倒有不少国务院部委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在批评他们。又有一天总编室的同事告诉我，一个“革命家”级的老同志受某部长之请，来问究竟批的哪个部门。原来紫阳总书记看了这篇评论，说“是哪个部门，查一下。”我说怎么教委没打上门来。

与国家教委的正面冲突发生在1988年4月。这一年年初，学校部获得一个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布告栏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人大的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决策的民主程序提出尖锐批评。我立即请记者部支援一个文教记者，再加上两个部门编辑共同采访。采访前主题我已经很明确，这是一个权力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官场病”。结果第一稿出来后，被这个文教记者写成什么学校的竞争机制问题。我当即枪毙。这位记者不服，要求分管副总编辑裁决，结果这位副总不发表意见，直接把稿件上交给老徐。那天我上班刚进办公室不久，老徐就拿着这摞稿件进来了。我问他“看了？”老徐就四个字“不知所云！”

我请记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门两位同事二次采访写作。前后折腾了四个月，我终于拿着万字小样在编前会上得意洋洋地说，“这篇东西已经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过去仔细看过，认可。

第二天就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出《倾斜的金字塔》。据传人大每个班因为只有一份本报，由一个同学朗读，大家静听。一位微信群友、当年正在人大读研，说这篇报道“把我们轰得灵魂出窍。”这是80年代第一篇全面调查披露行政权力如何膨胀、挤压教育的重头报道。人大校方气急败坏，因为记者之一正是人大毕业。真正震怒的是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因为报道中说，当大学校长们抱怨学校

自主权太小时，这位主要负责人问：“你们要什么权？”这等于点名批评了。

不知道教委是怎样与本报上级团中央交涉的。见报当天晚上，报社值班副总编辑接到团中央分管书记的电话，严令报社今后所有涉及国家教委的报道，必须事先经过教委审稿。这报纸还怎么办？

老徐看了电话记录，据说“脸色铁青”地立刻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说了什么，总之我在任学校部主任期间，没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审稿。大概在老徐的强硬态度下，不了了之。老徐把压力扛住了，没有向下传导。

由于密切的工作往来，共同语言也很多，我和老徐之间建立起一种近似朋友的关系吧。我们两人的办公室都在6层，老徐经常踱进来，一起抽支烟，聊聊有什么好书甚至有什么小道消息，彼此都非常放松，几乎无话不聊。我真的没把他当作是报社的顶头大咖。这一年我被任命为学校部主任兼科学部主任，据说是报史上的第一人，这当然表明了老徐对我的高度信任。

然而1989年到了，耀邦突然去世，引发了一场世界级的政治风波。在参加耀邦追悼会那天，我站在人大会堂东大门里，望着广场黑压压的十几万自发前来悼念耀邦的大学生，还有东门外阶梯底部整整三排长达百米的军人，真是百感交集。遇上了老总编辑钟沛璋，老钟脸涨得通红，气愤地用拐杖敲地，大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当年国民党就这样对待我们！”而对我刺激最强烈的，是那条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墨迹淋淋写着“新闻要说真话！”我清楚知道世界级新闻正发生在我眼前，这将是全世界主要报纸明天的头版新闻，而我们将一个字都不能报道，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这天晚上，几十个编辑记者没有回家，都在等待我们这些部门主任与总编辑们的交涉，我们强烈要求报道，否则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直到晚上10点多，老徐终于松口妥协，“先把稿件准备好吧！”众人松了一口气，按我的要求，当天在广场的人每人提供一条细节给我，我总其成为一篇广场特写。稿件很快完成，标题就叫“悲痛、冷静、理智”，这已经是最大程度规避政治风险，并且告诉大学生应有的态度。

到夜里12点多，经与人民日报对表，明天广场一个字都不能报。卸任老总王石从老徐办公室出来，对我们摇头，双眼通红。

然而这口气很难迅速咽下去。事件在急速发酵，4.26社论，4.27大游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接踵而来。5月初，一位部门主任动议，本报全体部主任总辞职以示抗议新闻管制。我当然不会同意，因为再清楚不过，这不是一家报社的问题，是整个新闻体制的问题，徒然给本报老总增加压力有害无益，我们应该寻求与中央对话。我的这个提议被迅速接受。我立即起草好要求对话的信件，考虑到如果仅是本报编辑记者的行为，将会给老徐出难题，还不如扩大为首都新闻界的集体行为。因此对话信件打印多份送往北京各大新闻单位征集签名。

老徐得知了此事，怒气冲冲进到我的办公室，关上门后大声说：“你幼稚嘛！常委怎么可能跟你们对话？！”我也来了气，回说：“平常当然不可能，但现在可能！”“为什么？”老徐怒问。“因为他们需要！”我吼道。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冲突，谈不拢了。老徐摔门而去。我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5月9日我带着首都1013名编辑记者签名的对话信件，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中国记协递交。既定方针是按合法程序走。我们有权提出要求，对方是否接受是他们的权利。根据以往的政治经验，接受对话要求的概率甚小。

5月11日中午，我进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个大纸条，上写：大同，今天下午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报社听取意见，请你务必出席。徐祝庆。谁会这么快来啊？我猜是中宣部长王忍之。直到下午1点才知道来人是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进到会议室时，人已经坐满，但在启立对面给我空出了座位，这是让我做主要发言的意思。尽管没有时间准备，我那天还是超水平发挥。对话长达三四个小时，直白坦率，启立给予积极回应，可以说非常成功。这是中共建政后，基层与最高层之间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对话。后来启立秘书告诉我，对话结束后在回去的车上，启立高兴地说，谁说和基层同志不能对话！对话的录音带曾送给耀邦夫人李昭听，李昭听完后说，青年报的人可真敢说话！

老徐也对对话结果非常满意，说，“今天的对话消息我来写！”

然而风云突变，广场大学生的绝食恶化了局势，社会激愤情绪被进一步点燃。报社也概莫能外，老徐作为体制代表，一时陷入编辑记者的空前孤立中。有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所有的桌子都挤得满满的，唯独食堂中心的一张大圆桌，只有老徐和女儿两人，没有一个人坐到这张桌旁。这场景实在是触目惊心。

我打完饭，径直走到老徐旁边坐下，和他说话。我惊讶地看到，老徐双眼充

满眼泪，马上就要滚落下来，他甚至无法抬头看我。见我坐过来，这张桌子很快坐满，老徐这才平静下来。这是我在报社生涯中最没齿难忘的一幕：一个全国性大报的总编辑，在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下，近乎崩溃！

风波落定。例行政治清洗开始。尽管对话活动严格遵循了法定程序，按当时的中央文件免于追究，但还是有一个常委领衔的“干部考察领导小组”单独下文，要求给这场对话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给予处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天，老徐跟我的谈话记忆犹新，先是给我看了“小组”的定性文件，然后老徐摊开笔记本一字一句地读，原来他已经写好必须说的话，基本重复小组文件，多一个字也没有。我听完表示不接受，将依党章规定程序申述。自然，这类申述从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纸面程序而已。

自此开始赋闲，大量阅读。眨眼四年多过去，报纸又一次改版，每周剩下两块板没人要，想起还有一个80年代的大编闲着，问我要不要。明知是死路一条，我还是要了，办不下去再说。没有任何一家大报会把两个整版交给一个编辑就不管了，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直至创刊号问世前两三天，老徐才给我打电话问：“你这个版叫什么名儿呀？”我刚好想出来，说叫“冰点”。老徐一听就笑了，“别的呢？”我说就这一个。老徐说，你总得给我几个可以选吧？我说就这一个，没的选。95年元月，《冰点》特稿版就这样登台亮相了，鬼使神差一炮打响。过了个把月，老徐跟我说，好几家报社老总给他打电话，问《冰点》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出来的，真好。“我真没想到读者这么快就接受了冰点这个怪异的名字。”

说来也真是匪夷所思。重返一线以后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老总事先过问我的选题，只看大样，真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大部分时间直接付印。而只要觉得有问题，老徐总是自己拿着大样来找我，一边商量一边删改。1998年报纸又一次改版，这次简单直接，每周给我四个版，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则毫不犹豫地将这三块版办成言论版，这是中国媒体的最大短板——严重缺乏编辑部意见。我跟老徐说我将每天刊出一篇《冰点时评》。老徐是搞言论出身，深知言论难写，他犹豫不定地说，“不一定要每天都有吧？”我说得每天有，“要不怎么能叫时评呢？”

《冰点时评》又是连滚带爬地坚持住，一年干出150多篇。一个省报评论部主任给我来信，说他一篇评论被总编辑枪毙，他问老总应该怎么改，老总回答说，

好好看看《冰点时评》怎么写。当然也会惹祸，有一次老徐拿了一份文件给我看，一看是某政治局常委对一篇时评的批示。我没看出是啥意思没当回事儿。过两天老徐见我说，你的检查呢？我懵了，啥事儿需要检查呀？常委的批示呀！原来只要是常委的批示，必须给中办上报处理结果。我只好写了一份“检查”，老徐一看，说你这叫检查吗？你这是辩护。算了，我来写吧！我又躲过一劫。

故事还有很多，一言难尽，点到为止吧。

2004年初，老徐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即将卸甲归田。我们一些和他共事多年的部下，在报社附近一家上海餐馆，集资摆酒为老徐践行。谁也没有想到老徐是有备而来。

老徐正色说，今天这个场合，我要首先对在八九风波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表示道歉。举座皆惊，对一个大报总编辑来说，这样的话在私下场合都不容易说出，何况公开道歉。这天的酒宴，因老徐的公开道歉而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有在场同事后来说，老徐的这个公开道歉反映出他真正的思想底色，为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信哉斯言。

中国青年报1978年10月复刊后，迅速焕发青春，进入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先后由钟沛璋、王石和徐祝庆掌舵，前赴后继，大约持续了25年。老钟主政时发表了“小厨师批评商业部长”的震动全国的报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打电话责问，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事先向书记处汇报？老钟平静回答：“你们不知道为好。”王石主政时发表了青海高干子弟杨晓民一案，受到“某老”无理指责，被迫写检讨，他跟我说，写不出来，“头昏脑涨，屁滚尿流”。最后还是老徐捉刀为他写完检查。王石此时距退休年龄还有多年，但他义无反顾辞去总编辑职务，不伺候了。老徐接任报社一把手职务达17年之久，可谓空前绝后，任内经历了八九风波，千钧重压，如履薄冰，最后还是不辱使命，光荣退役。

2004年12月，报社领导层发生地震，时任总编辑李学谦去职，从人民日报社调来李而亮任总编辑。他是一个经典的党报文化训练出来的人，很快就与中青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冲突。这年8月，李而亮精心炮制了一份中青报编辑记者管理条例，核心条款是：上级领导机关表扬，编辑记者就有赏；上级领导机关批评，编辑记者就要挨罚。这等于是彻底取消中青报的舆论监督功能，最终使中青报变成一家奴才报。8月15日，我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我对这份管理条例的抗诉

长文。长文立即被转到外网，引起强烈关注。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前辈亲笔来信，告诉我人民日报老同志都看了，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你。

老徐尽管退休了，仍按习惯每天上班。这天我俩在走廊相遇，我问他看了抗诉没有。老徐说看了，“他搞不成了！”此时老徐还是全国记协主席团成员，一天去记协开会回来，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是中间休息时，各大报总编辑把他围起来，纷纷打听抗诉结果如何，有的总编辑干脆就说李而亮简直是个二愣子，怎么可以在中青报搞这套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仅仅一天，这份管理条例胎死腹中，宣布作废。

2006年1月26日终于发生了勒令冰点停刊事件，我立即在网上公开抗议，构成重大国际新闻。春节过后，团中央书记周强罕见带着两位部长到报社现场办公。我去老徐的办公室，问他有何判断，“他们是想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来软的。”老徐想了一下说。

2月16号，报社社长向我宣布，《冰点》将在3月1日复刊。我作为主编去职。这次是提前6年结束了职业生涯。晚上回到家里，有外国记者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务院新闻办，刚刚都发布了《冰点》即将复刊的消息。一场官方闹剧，一个月就收场了。

再次赋闲，很少去报社了。但还有老习惯，买到一些国内看不到的书，譬如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邱会作、吴法宪回忆录等，我还是专门去了一趟报社给老徐送书。老徐看完后对我说：“观点如何可以讨论；档案材料触目惊心。”后来又有一次老徐给我带话，说人大新闻系前辈教授甘惜分听说我出了一本新书，向他要书，老徐说我也没有啊，嘱我务必给甘教授送一本。我次日即去报社给老徐送书，惜乎不在，只好请办公室转交。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了。

如今故人已乘黄鹤去。我们这些部下也已经垂垂老矣。回首经年，新闻理想主义，如今安在哉？

仅以这些零星回忆为老徐送行。一拜再拜。🙏

2022.1.6 夜

【怀人】

追忆邵燕祥

王端阳

转眼间邵燕祥先生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翻出十几年来我拍摄的有关他的照片，对照我的日记，进行了一番回忆和思索。

对邵燕祥先生我早就知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就和我母亲有过交往，那是我母亲在由他改编、孙维世执导的话剧《叶尔绍夫兄弟》中，扮演了唯一的女主角伊斯克拉。1990年邵燕祥还曾给我母亲回过一封信，信中所提雕塑家即我弟弟王克平，表示收到了他的贺年片。



邵燕祥 1990年1月4日致刘燕瑾信

但我和邵老没有直接的交往，倒是克平七十年代末调到广播文工团后，听说舞美队有个老右派，叫邵燕祥，出于好奇，便主动和他交谈，没想到很谈得来，便成了朋友。而我第一次见邵老，还是2006年克平从法国回来探亲，我们一起去拜访他。我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2006年4月18日

上午先陪克平去拜访邵燕祥，他们恐怕也有二十多年未见了。

交谈中，邵提到76年末克平曾给他刻过一方印章，至今仍在使用。克平已记不清了，要求拿出来看看。邵进里屋，不一会儿取出那方印章。克平仔

细看了边款，是一首五言诗：人尽两面派，印章何一面。不倒四人帮，九亿十八面。另有花开不忘浇水人字样。忆及往事，二人不时开怀大笑。后克平提出由邵将边款抄录下来，邵欣然答应。先拿来一块小纸，克平说不行，找一张大点好点的。邵顿时明白，重新找来一张信笺大小的白纸，很工整地将边款抄下，然后盖上印章。在交给克平时戏言：我们在制造文物。

克平也将自己画册题赠邵燕祥。

我拍下这组镜头，这肯定会是一组历史镜头，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

克平题赠中有这样一句：邵燕祥不老，XX压不倒。

2009年4月3日

上午陪克平去拜访邵燕祥。邵前不久刚做了个大手术，搭了4个桥，他说现在是“日理一机”，就是保养身体。

邵还谈了他创作《叶尔绍夫兄弟》的经过，妈妈曾参加过这个演出。

近中午离开，去对面的潘家园转了转，克平在不听我的劝阻下，又买了两件假文物，造型还不错，是生铁铸的。

我母亲于2012年去世后，发现她保存了70多年的日记，我们将它整理出来。我拿给《新文学史料》的主编郭娟看，她说，二十年代谢冰莹有一本《从军日记》，你母亲的日记可与她媲美。谢的日记应该说是战地记者的日志，第二天就在报刊上发表，而你母亲的日记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日记，并不是为了发表，而且保存了70年，直到主人离世。她还主动推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过郭娟的一系列运作，出版社决定出版，初步定名为《女兵日记》。她还提议最好能找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写篇序，我首先就想到邵燕祥。这样，我和郭娟一起拜访了邵老。

2015年8月17日

上午和郭娟拜访邵燕祥，受到热情接待。我先将克平的信转他，之后将妈妈的《女兵日记》打印件给他，略谈了一下准备出版的情况，希望他写篇回忆妈妈的文章，作为前言。他满口答应。我说没时间看日记，只写写排演《叶尔绍夫兄弟》即可。他说要看日记，看完了再写，看这个有兴趣。我还

把妈妈原日记带去两本给他看。他送我新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郭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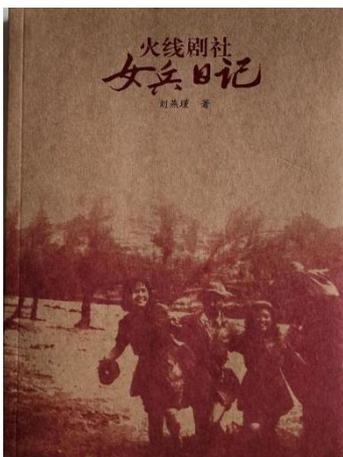
索要一本，邵讲，他从不送编辑书，知道他们手头压的书多，不看，但今天破例。也题赠郭一本。

还谈及文艺界一些逸闻。我写的妈妈和凌子风的文章，他从报纸上读过，还谈到最近看了一篇成都军区一个人写的许玉林和《腹地》的文章。

（我在给邵老和文秀大姐看我母亲日记的原件）我还没见到。临别送他一幅字：“盈缩之期……”他说是曹老的，还说是练过字的。

不久我就得知，邵老已经把初稿写了出来。我原指望能写个几百字就不错了，没想到一下子写了七千多字，其中写道：歌德以第一人称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而这一部真人真事的日记则是《少女燕瑾之烦恼》，她不是“无故寻愁觅恨”，而是如实写下了无处安排的种种心情意绪。这个评论真令我不胜惶恐。

2015年10月14日



上午将克平的铜雕给邵燕祥送去。谈到妈妈的日记，他给起了个好发行的书名：《爱，还是不爱？》可以考虑吧！我翻他看过的书稿（注：即我送他的打印件），都划满了，差不多每页都有，可见他阅读之细。他说过些日子再改一下，稿子也起了个名字，没记住。我把他手写的底稿要来，说这就是史料了。他说日记本身才是历史。

我把《砸教堂》的照片带去给他看了，他很赞赏，说这就是历史。同时送他爸爸的《文革日记》和我的《红卫兵日记》。他说这也是历史。2016年6月，《火线剧社女兵日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一些学者的好评。10月克平也赶到北京，我们再次造访邵老。

2016年10月18日



上午9:30和克平去看望邵燕祥。中午他们请吃烤鸭，直至12:30，聊了近3个小时。克平送他一个翻铜木雕《女人体》和版画《沉默》。邵送他的线装诗集和一本近作，也送我那本近作《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根据木雕翻铜的女人体，邵老很是喜爱）

中午，克平给陈丹青发短信，问是否在京。陈回短信：克平兄，我在南方，遗憾！画册早收到，你牛逼！丹青

我们和邵老有两代人的情谊，他的离去，在我们心里是无法弥补的。☞

2021年9月17日

【述往】

我被蒯团打手毒打十多个小时

陈楚三

1967年12月20日，414总部核心组在东主楼开会。记得这是一次核心组的绝密会议，大约只有13人左右与会，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非核心组成员不得参加，而且要求参会人员互相监督，对会议讨论内容不许做任何记录；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分析中央高层（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倾向，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常委排名二、四的林彪、陈伯达倾向极“左”思潮，而排名一、三、五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则比较温和。其实，在《东方红战团》内部早有此共识，这次秘密会议则使之成为整个414核心的共识；团派指责“414的核心是反林（彪）的，414的骨干是反陈（伯达）的，414的全体是反谢（富治）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据说工宣队进校后，曾有人从主楼的废纸垃圾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三五和二四之争”；听到这个消息的414核心组头头都有点紧张，生怕工宣队以此向414问罪，幸而工宣队可能不知道这张纸条的含义，没有人追究。我对这次秘密会议的印象很深，之所以认定发生在12.20这一次，是因为我记忆中

此后再没有到主楼参加过 414 的会议了。

这次秘密会议散会时已过中午，我因事走得更晚，心想若回到十三号楼前的食堂，那里肯定关门吃不上饭了，便背着书包到照澜院小饭馆吃午饭。正排着队，突然进来几个大汉，其中二人守在门口，另有三人疾步走到我面前，两人一边一个抓住我的胳膊往外拖，另一人在后面推我往前走，当时我班同学马耀辉见状冲上前阻拦未果；我一边挣扎一边叫喊，很快被拖到食堂门外。门外的马路上停着一辆浅颜色的小轿车，有人把后车门打开钻进去，架着我的两人使劲把我往车里推，一开始我用脚顶住车门边 134 不进去，车里的人使劲拉我的脚，两个大汉趁势把我推进车里，我的眼镜也被打掉；他们就这样绑架了我。马耀辉回忆：

1967 年 12 月 20 日中午，我从北京城里回来，大概快一点了，还没有吃午饭，走到照澜院饭馆进去吃饭，当时饭馆快收摊了，只有大概不到十人排队。突然，几个彪形大汉走到买饭队伍前面，抓住一个人就要往外拖，我一看被拖的人是我班同学陈楚三，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冲上前去抓住领头抓人的那个人的衣领，大叫‘你们为什么乱抓人！你们为什么乱抓人！’我和那个人就在饭馆抓扯起来，把一张饭桌都碰倒了，桌上的碗也打坏了。那个人当时想急于脱身，就用嘴在我抓他衣领的左手大拇指上狠咬一口，我因负痛就松开了手，他趁此就跑出去了。我也跑出去，然后往二校门方向跑。饭馆的工人就跟着我追，追到二校门时，他们把我抓住并送往团保卫组。当时团保卫组比较混乱，很多人去吃饭未回，抓陈楚三的人也没有赶回来，我想我得赶紧脱身。我就向接收我的人说，我因在照澜院跟人打架，把饭馆的碗打坏了他们把我抓来，我还没有吃饭，可以把学生证留在他那里，他同意了，我才趁此溜掉。我的学生证再也没有找回。

在小轿车的后座，印象中连我共四人，右侧坐两人，左边一人，我被夹在中间，两边的人继续抓着我的胳膊，我的眼镜已被打掉，他们很熟练地用一块黑布蒙住我的双眼；凭感觉，轿车在往清华北边的体育学院方向开。车上的几个人互相说了几句话，一人可能因绑架我的成功而忘乎所以，脱口叫另一人的名字“邢鹏！”马上被噤止，但已经晚了，我由此知道参与绑架我的人之中有邢鹏。

邢鹏为建工系钳工。据邱心伟、原蜀育《大事日志》载，团派在 67 年 11

月20日召开“控诉揭发旧清华大会”，邢鹏作为典型“以血泪斑斑的事实在会上控诉了他本人受害的情况”。邢鹏是团保卫部的值勤组骨干，曾任组长，专搞打砸抢抄抓。文革后期，他因“结伙盗窃校医院保险柜”“结伙偷撬水利系党总支办公室、政工组文件柜”“在机械系偷盗时行凶打伤值班人员”以及“阴谋策划纵火”等行为，于76年11月以盗窃、行凶、纵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¹

团派《井冈山》报145期（1968. 6. 7）透露，参与绑架和毒打我的团保卫组人员还有段洪水，他也曾为绑架罗征启而蹲守了三天三夜；²段洪水是学校修缮科工人，也是团保卫组的骨干，在5. 30进攻东区浴室时与守楼者对刺、从梯子上摔下，年仅18岁就不幸身亡。

在车上，这几个人就开始折磨我，他们拿出一把钢丝钳，使劲夹我的手指第三节指骨，我疼得哼出声来，钳子反而夹得更紧；过一会儿，再换一个手指，就这样夹遍了所有手指，直到七天后我返回学校时，每根手指背面被钳子夹出的血印还清晰可见。

不知道拿钢丝钳夹我手指的人是不是冯家驷。这个冯家驷，曾经用钢丝钳掰断了文学宓三颗牙，夹碎了贾春旺两颗牙，还用钉了钉子的木棍打饶慰慈，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打手；我的同班同学邢竞侯在蒯大富的黑牢中也曾被一个手拿钢丝钳的打手威胁。团保卫组和专案组中除了冯家驷，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有此“癖好”？罗征启说，他“曾无数次发誓一定要惩罚”冯家驷，但听说冯家驷离开清华后和一位女工结婚，那位女工得知冯家驷文革中的暴行时“竟然吓疯了”，如果惩罚冯家驷，“抓了他去坐牢，那么他的妻子谁来照顾？”所以罗征启“以直报怨”，放过了冯。³罗征启曾回忆汲鹏介绍与冯家驷见面的情形：汲鹏见到冯时称其“牙科大夫”，冯家驷说“我错了”，表示要“洗刷自己过去的罪行”。不过，原团派“罗文李饶专案组”的孙耘告诉我，冯家驷的妻子是冯的中学同学，知道清华有揭发冯家驷拔牙的大字报后问冯是否确有其事，冯反问：你是相信大字报还是相信我？答曰：当然相信你。这说明，冯的妻子并不是“女工”“吓疯”更是无稽之谈（罗征启被骗了）。冯家驷与其妻的问答还表明，冯家驷实际上否

¹ 见中整办调报字【83】3号文的附件2。

² 团《井冈山》报145期（1968. 6. 7）刊登的段洪水“讣告”中说，“特别是在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罗征启、陈楚三的斗争中，段洪水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期刊登的段洪水父亲的文章则说，“今年大年初一我们等他回家过年，一直没见他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在风雪中等了三天三夜捉到了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罗征启”。

³ 见罗征启回忆录《清华文革亲历记》。

认了“拔牙”的指控，企图向枕边人隐瞒自己丑恶的历史。而且我们至今没听说冯家驹向哪一个受害人认罪忏悔。可见冯家驹的表态是骗人的，不但汲鹏被骗了，罗征启也又一次被骗了！

绑架我的小轿车曾停在一处地方，估计是体育学院，有人下车，过一会儿回到车上，对其他人说：“小崩开恩”，我寻思，一定是他给崩大富打电话报功，崩大富可能要他们对我下手不要太狠。

车子继续开行了很长时间，我判断是开往城里。停车后，我仍然被蒙着眼带进屋里。后来才知道，这儿可能是骑河楼的清华招待所，已经被团派强占作为据点。开始，他们拿着从我书包中搜出的、登有《414战歌》林彪语录的小册子，问我是从何处得到的，我告诉他们是从军事科学院得到的；他们又问小册子上签名的“吉合”是谁，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知道这时的吉合已经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被隔离审查，他们如果了解到这一情况又会做文章，但既然小册子上有签名，他们要想做文章总能有办法查出签名人的身份，我提到吉合与我父亲的关系，也许他们就不做文章了。

显然，崩大富指使绑架我的直接原因，就是两天前414召开的大会上我在发言中出示载有《414战歌》林彪语录的小册子，狠打了团派极端分子的脸。《414战歌》的歌词是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曲调颇具鼓动力，凝聚着414派的斗志，团派对此十分忌惮，总想把它扼杀。崩大富曾向谢富治等求证，谢富治不知道这段语录，吴法宪则说林彪没有讲过这段话¹；于是，12月5日，团派突然发动了对《414战歌》的讨伐，《414战歌》被冠以“联动式”的“黄色歌曲”，其歌词用的林彪语录是“土匪术语”“法西斯语言”，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等等。为避免被动，414不少人着手寻找这段林彪语录的准确出处；我中学同学吉新玉也是我在新疆监狱中的小难友，她的父亲吉合当年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是我父亲的助手，全国解放后曾任驻苏联武官，卸任后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现已退休，家中有大量军事书籍，我专程去吉新玉家中查遍所有

¹ 吴法宪在接受师东兵采访时说过：“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见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引自师东兵《政坛秘闻录》），如果属实，证明吴法宪知道林彪说过这段话，但他出于迎合或者有意误导而对崩大富说了假话。

林彪的著作、讲话汇编等，终于在一本总参军训部印发的小册子中找到了这段话，这大约是在12月14日左右。我们有意隐忍，等着看谢富治、戚本禹和蒯大富究竟还能跳多高。12月16日，谢富治和戚本禹进一步说，这段语录“林副主席没说过”，是“谣言”，是“造林副主席的谣”“罪该万死”，并且明确宣布“清华大联合要以团派为核心”。在414于12月18日召开的大会上，我发言宣读了《414战歌》中林彪这段语录的全文，并出示了登载有林彪这段讲话的小册子，把“炮打林副统帅”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在了蒯大富头上，实际也戴在了谢富治戚本禹头上；同时根据毛主席关于“核心”的论述，批评谢、戚12.16“以团派为核心”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大会使414士气大振。蒯大富压垮414的企图又一次破产，“文斗”斗不赢，就采取绑架、抄家等卑劣手段，诉诸武力。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被绑架的当天，蒯大富不仅指使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中团派的十六名头头发声明宣布我是反革命分子，而且公然“通缉”四十一名414派的头头和骨干，派人抄了二十多名支持414的干部和教师的家，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

打手们在查问林彪语录的小册子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接着就对我开始了凶残的拷打。

他们先剥去我穿的棉衣；当时是冬天，我的棉帽很厚，他们把帽耳放下来，反扣在我头上，正好捂住我的双眼。他们用拳头从我两肋下的腹部向内向上猛击，疼得我几次弯下腰；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打人很狠毒，看不出外伤，肋骨没断、胸部也没有外伤，但腹内脏器受到猛烈打击，容易造成内伤。打完后凶手们歇了片刻，又击打我的头部。他们的拳头，雨点般准确地落在我双眼的眼眶上，虽然我的眼睛被棉帽捂住，闭着眼一片漆黑，但当拳头不断打到眼眶上时，却真正领略到“眼前金花乱冒”的滋味。又休息片刻后，打手们把我推向屋子中间，前后左右各有一人站定；“游戏”开始，后边的打手猛不防踹我一脚，左右两侧的人同时伸出脚来，当我被踹向前扑时正好左右两边的脚也伸出绊住我，而前方的打手趁我快跌倒时抓住我的双手，返身一个背摔将我摔在地上，然后从头再来。如此反复多次，打手之间的配合非常熟练，由于我双眼看不见，几乎每次都被摔倒。我一直在想，团派保卫组的这些打手们是否经过专门训练？他们专打两肋下的腹部，没有外伤；他们专打两眼眼眶，而且在被打者蒙住眼睛的情况下准确“命中”，

头部也没有外伤（如果误打到鼻子、脸颊，就可能会出现外伤）；他们摔人的“游戏”配合默契，一气呵成。如果未经训练，是很难做到的。当然，如果没有蒯大富的“关照”，我很可能会被打断肋骨、头破血流，那把钳子就不只是夹我的手指，很可能会伸到我的嘴里去拔牙！所以，我倒是应该感谢“小蒯开恩”。

打我、摔我，用钢丝钳夹我，这些打手们似乎还不“过瘾”。过不久，我听到旁边擦火柴的声音，接着就感到一根点着了的火柴伸到我的脸旁，我稍一转头，对着火柴方向很快用鼻子猛一呼气，把火吹熄；如此反复三次都被我吹熄了。第四次，又听到划火柴声音，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再次用鼻子把火吹熄，可这次火柴不来烧我的脸了，旁边的人按住我的脖子，把点着的火柴放到我的后脖颈上，我只好强忍疼痛直到火柴熄灭。看来他们是不给我破相就不死心。第五根火柴划着后，旁边的人用它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后喷到我脸上，再吸几口后把烟头按向我的下巴，我本能地要躲开烟头，但打手们使劲夹住我的头不让动。就这样，我的下巴被烟头烫起了泡，左右腮帮也被烟头烫起了泡；七天后我在414的欢迎大会上控诉团派打手的暴行时，脸上的四五个烟头烫出的伤疤仍然清晰可见，台下有坐在前排的女同学当场流下了眼泪。

残酷折磨我十多个小时后，半夜两点左右我被带出大门，转到一辆吉普车上送进了监狱。进监狱使我略为安心，监狱里至少不会像蒯大富的打手们那样残酷折磨我吧。出监狱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功德林监狱，这里曾经关押过国民党军队被俘的许多高级将领。我的朋友汲鹏，他的家就在功德林监狱附近。

起初我不知专政机关以什么罪名接收我，是“造林副主席的谣”吗？我们已经找到林彪原话了呀！在狱中第一天我就绝食、要求审讯，要求弄清楚我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是什么；当天下午，狱方提审。

审讯人员首先说我反谢副总理，反对谢副总理主持制定的“四项协议”，并在12.18大会上说谢副总理12.16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回答说，我对谢副总理偏袒蒯大富确有意见，“四项协议”第四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所以我反对“四项协议”；至于12.18大会的发言，我告诉审讯人员，毛主席说过“核心不是自封的”，谢副总理的12.16讲话封“团派为核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的确有意见；但有意见提出批评不能等同于反谢副总理。我并没有反谢副总理，相反，我在大字报上一直说谢副总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特别举了我在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小报《红军工》上发表的文章为例，文章说，谁要到北京炮轰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我们就把他赶出北京！这就证明我没有反谢副总理。

审讯人员没有再提反谢问题，而是接着问我，你说过毛主席是太阳、江青同志是月亮，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是反射太阳的光辉，这是不是反江青同志？我很诧异，立即回答：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审讯人员说，你写的大字报《闪光》是什么意思？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蒯大富就是这样给我罗织“反江青”罪名啊！

1967年11月12日，江青发表讲话，中心意思是不能用批判文革初期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包庇十七年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团派以为抓到了稻草，借此把“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帽子扣到414头上。但是，江青讲话中还提到对文革前的十七年要一分为二。以我为主要执笔者起草了一篇大字报，用五个战斗组的名义联合发表，一方面用很多实例把“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帽子还给蒯大富一伙，另一方面按照对十七年一分为二的意思，指出也不能“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充分肯定了清华十七年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清华广大干部和党团员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批驳了蒯大富“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的错误。鉴于团派某些大字报的论点乍一听理直气壮，确实能迷惑一些人，我们的这篇大字报标题借用了列宁的一句话：《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闪光”是针对蒯大富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被团派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说这“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大字报”。我对审讯人员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你们到清华看看《闪光》大字报，就知道我是否“反江青”了。

12月27日凌晨，我被释放，从功德林监狱直接送到人大会堂参加谢富治、戚本禹等人对清华两派头头的接见，既领略了谢富治戚本禹巧言令色掩盖他们否认和辱骂那段林彪语录的尴尬，又见识了这二人互相吹捧的丑陋表演；接见结束后回到清华，受到数千人的夹道热烈欢迎。

清华两派的“文斗”，团派始终无法占上风。“战歌事件”又以团派的失败而告终。但蒯大富们并不甘心，已经把武力剿灭414提上日程，紧锣密鼓进行准备，在414内抓出“反革命集团”就是其最重要的舆论准备。即如“战歌事件”，他们起初说是“炮打谢富治、戚本禹等中央首长”（《井冈山》报106期），后来戚本禹垮了，他们先是利用杨余傅问题栽赃，说战歌事件是老四“陷害吴法宪同志”（《井冈山》报130、131期合刊），不久又进一步颠倒黑白，说战歌事件是“攻

击陷害林副主席、谢副总理、吴法宪司令员”（《井冈山》报 141、142 期合刊），我也成了沈一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井冈山》报 139 期）。

1968 年元旦刚过，蒯大富就挑起了 1.4 武斗。接着，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又先后被编造、炮制出来，开启了清华文革最血腥、最黑暗的时期。📷

【书讯】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新书出版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专注文革历史书籍的出版，特别重视文革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期望为文革历史研究留存不可缺失的以个人视角记述的史料。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创立十一年来，始终坚持以史料的真实性与兼听则明的立场，精心选择书稿，不断推出新书。文革亲历者敖本立所着“亲历与思考系列”全套六本中已有（一）（二）（五）三本出版。

1. 亲历与思考系列（一）《周恩来要我批陈云》



内容简介：

1966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他支持成立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财贸口的造反派“要跟领导中支持你们这个造反运动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好好地把财贸系统的财经政策各方面研究一下，把受旧社会影响的，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受修正主义影响的一些东西揭发出来”。

随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等财贸口领导，都先后讲话与检讨，写文章、写大字报，揭发批判陈云的右倾思想与反动路线对财贸口的影响。

1967 年 1 月 11 日凌晨，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的一次接见时，对作者说：“陈

云的右倾思想，你们财贸口可以批嘛！”在周恩来的指示与支持下，国务院财贸口发动展开了对陈云的揭发批判运动。本书真实地记述了文革运动中，财贸口批陈云运动这一史实的始末。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所说：“历史常有你想象不到的丰富多彩。历史中的大人物也常有你不知的多面人生。”

（定价：港币 218.00 元）

2. 亲历与思考系列（二）《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



内容简介：

1927年至197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关系中，最重要的应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了。本书作者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表述他们之间的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二月逆流””大事件，本书认为实质上是周恩来为首与掌控的““二月逆流””派与毛泽东支持的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亦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既团结，又斗争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本书真实地反映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实情，现在还原历史的真相，周恩来就是文革中党内派别重组后的““二月逆流””派的头。作者文革运动中被卷入““二月逆流””事件，本书以其亲身经历与感受，探寻思考这一大事件中两大谜团的真相：一是毛泽东1967年2月19日为何批右发怒斥责““二月逆流””与周恩来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各部造反派代表时，批左发威抓捕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之间的关系；二是毛泽东指示党内批评““二月逆流””的政治局生活会为何变为中央文革发动群众公开反击““二月逆流””？并由此引发了北京造反派组织的分裂。

本书不但为中国文革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亦为文革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必在文革历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定价：港币 298.00 元）

3. 亲历与思考系列（五）《周恩来领导财贸口文革史料汇编》



内容简介：

叶剑英曾对朱成昭说：“我们不怕乱，也不怕群众运动，就怕没有对运动的领导权威。”

国务院财贸口的文革运动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干预下进行的。作者收集汇编了周恩来财贸口文革运动的讲话、指示以及李先念、姚依林等财贸口各部领导人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文革运动中活动与表现的史料；同时亦录入财贸口群众组织活动的有关史料等。本书为研究和关注周恩来领导国务院属各部委文革运动，现解毛泽东与周恩来时期的“和而不破，斗而不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的较完整的第一手史料。

（定价：港币 268.00 元）

说明：“亲历与思考系列”（三）《周恩来与清查“5.16”运动》，（四）《周恩来与文革抓叛徒》，（六）《我与张高丽在深圳打官司》三本书尚在准备出版中。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地址：

香港九龙湾宏冠道6号鸿力工业中心B座二楼31室

联系电话：852-23384828 852-53628548 852-97302554

电 邮：wengelishi@163.com bookhistorybook@gmail.com

邮 箱：香港摩利臣山邮政局47394号

联 系 人：田申☞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